

蘇魚  
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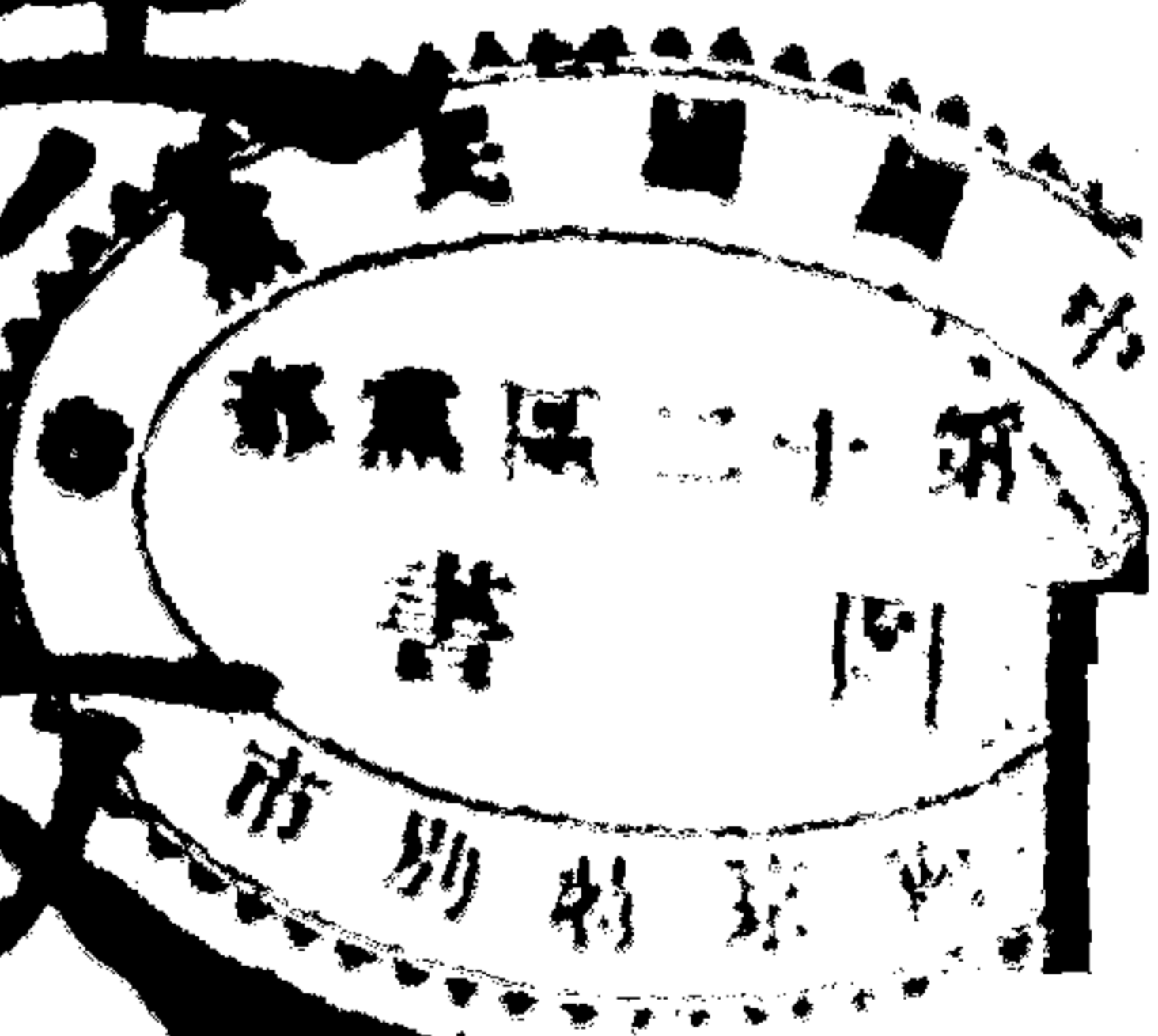
楊幼烟著

解平



吾才方弄

正父



漢文著檢



# 蘇俄民族政策之解剖

## 目錄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蘇俄對內民族政策之實施	七
第三章	蘇俄東方政策之真義	一七
第四章	蘇俄民族政策與土耳其國民黨	二九
第五章	蘇俄民族政策與印度的革命運動	三七
第六章	蘇俄赤化蒙古之猛進	四七
第七章	蘇俄對華政策之歷史底觀察	六五
第八章	蘇俄最近對華陰謀之暴露	九三
第九章	民族自決與我國民族革命之前途	一二七



# 蘇俄民族政策之解剖

## 第一章 緒言

自十九世紀以來，近時國際政治舞台上，最流行的是百年以來的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動，有意無意間，都以「民族問題」為中心。因此帝國主義者與一般野心的政治家，都拿民族主義做工具，一方面可以緩和革命的危險，他方面又可以為爭城奪地的遁詞。拿破崙以前曾經利用法國革命後簇新的民族思想；凡是他軍力所及的地方無不以「民族主義」來鼓動各民族，藉以滅殺各國政府聯合抗法的實力。當時被拿氏鼓動而與法國結盟的，果然有不少的國家；可是等到拿氏成功以後，又馬上壓迫各民族起來，同時全歐洲的民族又拿他曾經號召過的民族主義來對抗，拿氏卒因此失敗。歐戰前後，民族自決的風潮正盛，威爾遜的十四條，幾被尊為摩西底「十誡」。但是在「民族自決」的呼聲下所得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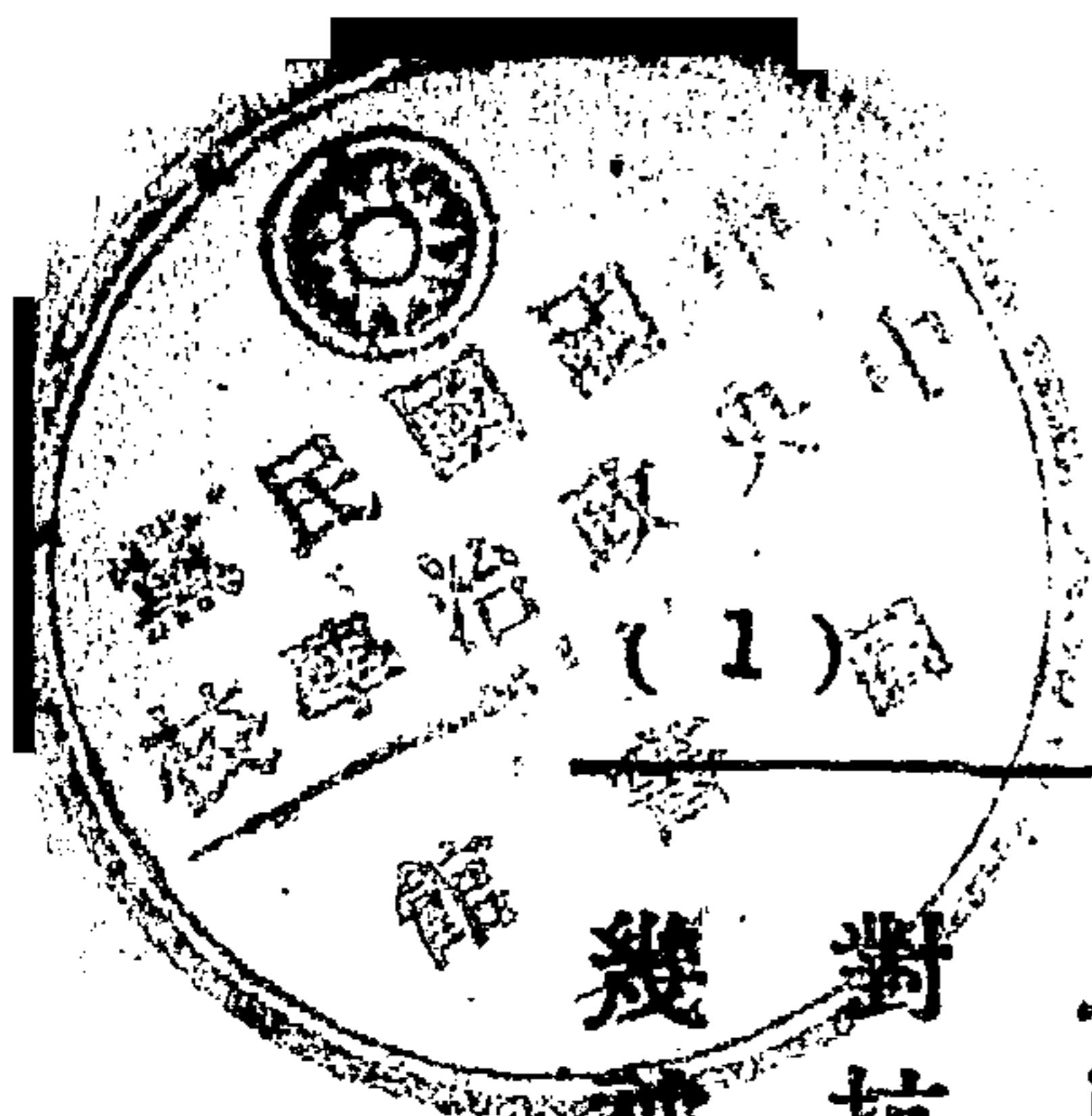


楊幼炯著

(南)

緒

546.52  
273  
2 言



不過是成立了近東若干混合民族的新國家，在殖民地統治的政治上，憑添了一些委任統治的新名詞。所以近百年來的歷史告訴我們，被壓迫民族要求獨立的民族解放主義，是在這帝國主義的列強共同宰割的世界政局下，必然發生的現象，但同時在這種民族自決潮流正在高漲的時候，是常易為帝國主義及其他野心家所利用的。

近十餘年以來列寧所統治的蘇俄政府，也看到了這種「民族政策」的妙用，所以他們不惜因襲了往日帝國主義者的故技，拿民族政策做成他們在內政外交上出奇制勝的工具，他們這種政策的實施，可以使以前在沙皇統治之下的各民族都先後就範於蘇維埃俄羅斯的統治，更以「民族自決」與「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為口號，以博得東方各弱小民族的同情，使蘇俄在國際上的地位，日益增進，鷹眸虎視的列強，也不得不為之却步，這點可以說是列寧派的共產黨人得意之作。

本來，共產主義者心目中是沒有「民族」的，因為他們認定「民族自

決」的口號，在社會革命時代適成了聯合反革命勢力的口號，一八九六年社會主義國際大會在倫敦開會的時候，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引起很大的爭議，同時又因為波蘭社會黨根據國際承認波蘭獨立的口號，認為最恰當的目標，致遭著名共產黨領袖盧森堡（Rosa Luxembury）及波蘭社會民主黨左派猛烈的攻擊。他們以為這種主張是反動的行為，各民族的獨立生存，是違背了合理的經濟集中，這是因為馬克思主張以階級鬥爭為社會革命的基本，勞動者須為國際的聯合。所謂「工人無祖國」就是說，個個勞動者都是世界人，他們認定「民族」的界限和條件是「資產階級制度必要形式」，也是「資產階級的祖國」，而社會革命不是在祖國的舊界限中所能得勝的，必須消滅民族的界限，創造人類最新共同生活的形式。換句話說，社會革命的理想是要在民族的廢墟上建築起來的。馬克思派「反民族」觀念的強烈，如此可見一斑了。

但是自號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對於上述反民族主義的論調，竭

力駁斥，說他們是患的「左派的幼稚病」，完全沒有注意到歷年來各被壓迫民族的獨立精神，所以列寧便於馬克思主義之外，另闢蹊徑，自成一種列寧主義的系統。

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地方，最大的是馬克思重視分析客觀的經濟環境，企圖以社會科學的公律，解釋社會現象的原因，他與昂克思把資本主義的社會加以徹底的研究，根據當時考察的經練，造成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的大綱。所以馬克思就決定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無產階級占全國民衆最大的多數，文化程度最高，民主主義最盛的國家裏，才可以開始無產階級的革命。但是列寧的理論，則認定這種結論絕對不確，他以爲不必一定要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才能開始無產階級的革命，在工業落後的國家裏面，勞動者的人數雖然很少，但是可以煽動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以滅殺帝國主義列強的威勢；且可以更進一步以「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口號，取得他們多數的同情，加大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所以列寧就於馬

馬克思所提倡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之下，再加上一「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一個口號，成功所謂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但是實際上列寧既以階級的革命為主，當然是利用東方弱小民族爲輔；並且拿階級鬥爭爲基礎的無產階級聯合，是一種縱的聯合，可以衝破民族革命的橫的聯合的，由此可知列寧主義中的民族政策，也全在利用民族主義，以號召東方民族的革命勢力，用來促長他們無產階級的氣焰的。





## 第二章 蘇俄對內民族政策之實施

列寧的民族政策，最初是用來促成十一月的革命，本來民族問題在俄國，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在帝政時代以過半數非大俄羅斯的民族，語言不同，文化習慣各異，與大俄羅斯民族同處在「沙」皇政府統治之下，受了強迫的「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和難堪的政治經濟底種種壓迫，更益以文化上施以慘毒的壓迫，凡藝術上之含有種族情感的，都被禁止，民族固有語言文字也被屏斥於學校、社會及國家機關之外，而各民族所有的獨立與反抗的企圖，又都被哥薩克騎兵預先壓伏下去，各民族對於俄國的深仇宿恨，自不待言，所以帝國時代俄國雖擁有廣大的版圖，但在「沙」皇統治之下，除了少數的大俄羅斯民族以外，其餘大多數是被俄皇征服的弱小民族，據一八九七年的統計，全帝國的人口一二八〇九二四・六九人，到了一九一四年俄帝國的領土，更擴大到二一〇七四一・八七四平方啓羅米達；人口

更增加到一八一·一八二·六四五人，這樣版圖擴大，人口衆多的帝國裏，內部民族既這樣複雜，各民族的待遇又極不平等，因此俄國的民族問題，巨半世紀仍不能得到解決。

共產黨要人季諾維夫（G. Zinoviev）說得好：「民族問題正當的解決，是革命成功解決的百分之五十」這就是說：俄國民族問題，是俄國革命原動力之一，若是民族不能得到適當的解決，俄國的革命，還是沒有完滿的結果，自從三月革命以後，蟄伏在俄皇專制權威之下的民族運動，遂一發而不可復遏，舊俄境內各民族都大家起來組織「民族蘇維埃」；而臨時政府提出民族自決的要求，同時韃靼民族聯合俄國境內的回教徒，在卡站組織「回教蘇維埃」，巴庫地方也有同樣的組織，烏克蘭與芬蘭兩民族又羣向臨時政府宣布獨立，結果在俄國全境內的各民族，形成異常複雜的局面，舊時秩序既完全以威權維持，一旦威權失墜，新的有力政府又未造成，各民族間的關係，更因之異常混亂，臨時政府外貌雖承認「民族自由」，實際

上仍然沒有完全放棄俄皇政府傳下來的對於各民族的優越權；並且還想進一步謀軍事上的發展，打通地中海的交通，佔領土耳其和小亞細亞，俄國民族問題，至此愈無解決的希望了。

在他方面俄國資本主義最弱，俄羅斯中部和北部接連都是廣漠的耕地和森林，許多小都市中工場制的工業，還不見得十分發達，大部分還是盛行手工工業，所以大多數是純粹的農民和手工的勞動者，而熟練的勞動者，仍占最少數，三月革命發生後，孟謝維克黨仍握有大多數的農民及手工勞動者，而當時列寧一派布爾謝維克黨人，仍只有幾處產業中心地方的少數熟練勞動者，在這種產業落後的現狀之下，布派欲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是十分困難的，於是不得不採取「民族自決」與「勞農聯合」的口號，求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線，後來更鑒於臨時政府對付民族問題的失策與各民族歷年反抗大俄羅斯民族心理之不易消滅。列寧派對於「民族政策」的應用，愈加認為重要。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國共產黨開第一次大會，

會場上發布關於民族問題的意見，後來十一月革命以後，列寧執政於十一月二日又發表一篇「俄羅斯民族權利宣言」。是年十二月並宣布承認芬蘭及烏克蘭兩民族共和國「有完全從俄羅斯分離之權」或「與俄羅斯有發生聯邦關係之權」。這自然是列寧政府聯絡俄境內各民族的初步。

列寧政府所以犧牲「共產主義者沒有民族」的主張，必須採用「民族自決」的口號，實有兩大原因：第一想拿「民族自決」來結合各民族的革命勢力。自革命以來，各民族脫離了俄皇的壓迫，獨立運動一時遂風起雲湧起來。但各民族因利害關係，對於大俄羅斯民族，多處於分離的地位。當時俄國的中央政府權力，尙未鞏固，所以不得不順着自然的趨勢，表面上予各民族同情，企圖結合他們革命的勢力，使蘇維埃的基礎，得以鞏固。第二當時協約國又利用從舊俄分離出來的民族，反攻新俄。蘇維埃政府因此不得不以民族平等的口號來促起各民族的獨立，使各邊境的民族獨立後，可以作為俄國與各強國的緩衝地。因此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全俄蘇維

埃第十次大會，由斯丹林(Stalin)提出聯絡各共和國爲一大聯合，結果通過組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計劃。當時斯丹林在大會上把不得不聯合各民族的理由，狠露骨的說出，我們尤可以因此知道列寧派不得不利用民族政策客觀的事實。斯氏提出的理由，可以分爲三大項：

(一) 對內的關係——(1) 俄國因歐戰與國內戰爭的結果，共同感覺經濟來源的缺乏，必須合作。(2) 歷史上各民族間自然分工，創成互相依賴的狀態。獨立生存以求完滿的發展，殆爲不可能的事。(3) 主要的交通機關之統一，在各國發展上有重大的作用。(4) 財政來源缺乏，不得不設法共同整頓。

(二) 對外的關係——(1) 因軍事要求，必須聯合戰線抵抗多方面仇敵之進攻。(2) 對外商業與外國資本接觸，需要嚴密的統一。

(三) 蘇維埃組織是國際的，應該盡量發揮勞動者團結的精神。

到了後來俄國境內各民族，除用武力脫離外，其餘的仍就受統治於列寧

主義之下的有芬蘭·愛沙·尼亞·萊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等國家，而烏克蘭·白俄·喬治亞·阿才倍疆·亞美尼亞·等屬地，雖幾次運動獨立，但終成爲莫斯科治下的獨立國。現在蘇俄政府所謂聯邦共和國，在表面上雖包含二十八個蘇維埃共和國，但經莫斯科政府正式承認的，實際上只有前述的七個共和國，此外不過是一種自治共和國或半自治產業區，所以在外交上也沒有獨立性。

蘇俄這種對內民族政策的實施，經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間拉攏各民族的結果，總算是告厥成功。但是列寧這種民族政策對內的運用，其用意已如前述；更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列寧派對於俄國境內各民族聯合的無誠意，實際上在利用各民族聯合，來維持其壽命。今試舉下列各項事實來說：

(一) 俄國共產黨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本遠在一九〇五年以前當時社會民主黨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猶太工會因受奧國社會民主

黨的影響，主張在「沙」皇統治之下，取得「文化自主權」；並謂猶太工人，在俄國工人中有種種特殊情形，要求另組織一種民族的團體加入，但引起列寧派極端的反對，說是這種獨立民族政黨的組織，分散了俄國共產黨的勢力，拒絕猶太工會的要求，結果他們遂決定退去俄國共產黨。可見「民族獨立」的要求，本非列寧派所願意；但是為環境逼迫，到後來也不得不採取民族自決的妥協手段，使危機四伏的列寧政府，臻於鞏固，實際上列寧民族政策之為一種利用的工具，由此可想而知。

(二) 列寧當十一月革命之後，本想用武力收復各民族；一九二〇年春季進攻波蘭，就是這種計劃的開端。在列寧以為波蘭以武力征服後，其他各民族自不難一一就範，同時企圖由波蘭西進，實現了直接赤化歐陸的理想，所以不顧俄國當時久經戰亂民生疲弊的狀態，調遣赤軍向波蘭進攻。最初三四個月之間，似尚佔優勢；待迫近華爾塞



的時候，波蘭軍反攻極力，赤軍騎兵隊首先敗退。全軍大受打擊，不得不立下總退却的命令。不獨蘇俄自身因此陷入極危急的狀態，不得不改用和平的手段與各民族妥協；同時列寧向歐洲西進的策略，也不得不受一極大的頓挫。回溯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赤軍正進攻波蘭，列寧與各國代表指着地圖，歡呼赤軍直入華爾塞，此處尤可以顯示列寧派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同年九月蘇俄又因燃料缺乏，令赤軍強奪巴庫。次年二月又侵佔喬治，所以實際上俄皇統治下的各民族，仍是受蘇俄的壓迫，而且喬治的獨立運動，在蘇俄治下，曾經暴動幾次，終被鎮壓下去，這更是很明顯的例證。

（三）布哈林在共產黨綱裏說：「各民族可以獨立，但須組織蘇維埃政府，否則我們爲該民族的勞動者起見，雖用武力亦所不惜」。布氏又在國際解放中說：「我們須注意此地所說的無關於民族（就是無產者和有產者在一起）自決權。只不過說到無產者的權利。」

這就是說所謂：「民族的意志」在我們並不算是神聖的、無產者羣衆的意志、在我們覺得是神聖。所以我們不說一個民族的自決權。只說各民族勞動階級的分離權、這件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是勞動者的蘇維埃會議議決的；而不是民族的憲法會議議決的。如果在俄國任何一部、同時召集了兩個會議——一個是民族的憲法會議、一部是勞動者的蘇維埃會議。若是憲法會議主張分離、無產階級的會議、就來反對他、那時我們就用各種方法（包括武力在內）去擁護無產階級會議的決議、而反對民族會議的決議」。布氏的話、可以說是把蘇俄對內民族政策的背面、完全供出、我們因此可以知道所謂「各民族勞動階級的分離權」與「勞動者的蘇維埃」都是俄國共產黨統一與莫斯科統治的代名詞罷了。



### 第三章 蘇俄東方政策之真義

俄國共產黨對於國內民族問題的解決，只是他們的民族政策第一種的運用，俄國共產黨若是要求其所謂「世界革命」的實現，非俄國一個國家實行共產主義就能成功的，必須全世界都成爲共產主義化，始能有實現的可能。西歐幾個產業先進國是帝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地，有多量的無產階級，假使蘇俄政府能夠煽動他們，爆發革命，可以使各帝國主義的國家立呈分崩動搖的現象，這樣不獨可以使蘇俄的國基鞏固；而且可以積極的促成世界革命；但不幸由俄國共產黨所主持的第三國際近年以來，向西歐煽動無結果，匈牙利及德國的共產革命不獨鏡花一現，失敗於前且因此促成了近年以來德意法各列強政府極端的反動；同時列寧政府進攻波蘭以武力直接赤化歐陸的理想，又因華爾塞一役的慘敗，不得不停止進行，於是列寧派西進的計劃，完全歸於失敗，又不得不改變戰略，轉向東方來，這便

列寧底民族政策第二種的妙用了。

東方本是各弱小民族的棲息地，是帝國主義消貨投資的場所；又爲列強殖民政策實施的根據地。自歐戰以後，東方各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爭取自由獨立的運動非常熱烈，列寧政府欲減退列強資本主義的勢力，非籠絡各弱小民族的國家，促起他們的同情不可。於是東方的民族獨立運動一方面做成了列強進攻蘇俄的前衛；他方面更變成蘇俄抵制列強的工具。近來東方各民族便時時受着這赤白兩種勢力的侵襲，仍然不能由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這就是因爲有蘇俄民族政策在裏面作祟的原故。

自然在東方各被壓迫民族的心理，都希望在帝國主義宰割之下解放出來，列寧便因此更進一步，向俄國境外的東方各民族，揭起了「民族自決」的旗幟，隱藏着共產革命的面目，專鼓吹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極力求東方民族運動的發展，拋棄了向西歐「強襲作戰」的方略，採取持久作戰的手段，以各被壓迫民族爲主力軍，間接由東方進攻，援助各民族鬥爭的革命運

動、驅逐列強在遠東的勢力、使東方各民族受蘇俄的指揮、成功所謂「世界革命的預備隊」。

關於蘇俄民族政策的意義、主持這種政策的斯丹林、解釋得非常明白、他說：

「帝國主義猶如一件物體的兩面、西洋是這物件的正面、東洋則是這物體的反面、我們進攻的路線、無論是正面或反面、但其結果都是一樣的、我們如果能夠煽動殖民地的民族起來從事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這簡直是截斷帝國主義的後方、使他正面大受影響到了相當時期、便可以雙管齊下、前後一致進攻、結果使帝國主義的大本營、歸於覆滅。」

斯氏的話、已經把蘇俄利用東方民族、從事背面的攻擊、以完世界革命的用意、很露骨的說出來了、他們覺得歐美列強在東方的殖民地或屬領地、或半獨立國、在這些地方、必須鼓吹民族革命、求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同時並應在革命運動的進展中、必須利用階級的分化、促成無產階級的團結、以

握得政權，列寧在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中，提出「對弱小民族及殖民地政策基本案」十二條，其中重要的原則，就是：

「第三國際的弱小民族及殖民地政策之基本，是圖各國勞動階級相互的接近，什麼緣故？因為不如此，就不能戰勝資本主義。」

「在蘇維埃俄羅斯樹立的勞農專制，必然的非以全世界之資產階級為敵不可，因此，在一方面，蘇維埃俄羅斯非把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牽做自己的一派勢力不可，在他一方面，它們也非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同盟，不能得到解放之路。」

「聯邦組織」是各民族完成團結的過渡形式；俄羅斯由此政體而確定與其他民族共和國之關係；第三國際的使命，是在就此政體之上，期新聯邦組織之發達。」

列寧又在他的原則上，舉蘇俄與烏克蘭、鞏都等自治共和國的關係為例，證高呼「世界蘇維埃聯邦化」的口號，其用意自不難想見，列寧更規定共

產黨對於文化落後的國家，應採的方針，就是（1）各國共產黨，援助弱小民族之革命解放運動；但援助之程度，當與該國之共產黨協定，特別的是與該國經濟關係之最密切的國之勞動者，當負援助之責任。（2）當與宗教方面之中世紀的反動勢力戰。（3）汎回教主義及汎亞細亞主義，是正在和歐美的帝國主義戰的，而同時將使土耳其和日本的帝國主義強大，因此須排斥之，務要滅却封建制度的殘骸，濃厚農民運動革命色彩，儘可能的範圍，結合農民及其他一切被壓迫階級，作成蘇維埃，以建設西歐共產的無產階級與東方革命農民運動之間的鞏固的同盟。（4）弱小國之特權階級，往往借助於帝國主義的援助，而形成僅是政治上獨立的國家，至於在經濟上財政上和軍事上，却陷於帝國主義屬領的狀態；共產黨非和這種傾向反對不可。

此外列寧又有附帶的六項，把他的政策，更具體的說明（一）第三國際先不可不確定我們與中國及印度的革命運動之相互關係，由歐洲大戰以



來、世界資本主義已集中於這一點、歐洲的勞動運動是與非歐洲之被壓迫國解放運動有密切不離的關係、(二)歐洲的資本主義爲主的是以其力向殖民地榨取、帝國主義之魁首的英國、以亞細亞及亞非利幾億萬人爲奴隸、同時又壓迫英國自己的勞動者、由殖民地榨取的暴利、是現代歐美資本主義之主要的資源、(三)歐洲列強失其殖民地、引起本國內勞動革命的時、便是歐洲資本主義倒斃的時、因此、爲世界革命的勝利、殖民他與勞動者、於其解放運動、有協定必要、(四)歐美之帝國主義、爲自國土業保護、妨害了東西國民之經濟的發達、因此、東方爲世界經濟落後的民族、多數的人民從事農業、僅能做成原料品、所以殖民地的革命、在第一步非驅逐外國的勢力不可、(五)兩個互相反抗的運動；其一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民族運動、此以儘資本主義制度存續而解放其民族者；又其一則爲勞動者及農民、脫却一切榨取勢力之羈絆的運動；前者常欲制後者而置之於其支配之下、因之我們的革命的第一步、雖在外國勢力之驅逐而其最切要

之使命是在於組織勞農團體而直進於蘇維埃共和國之建設，故在在文化落後的國，勞動民衆將立於先進國無產階級指導之下，隨其階級意識之發達，可不經資本主義發達之過程而進於共產主義，此等國家，已有組織的革命黨存在，共產黨可與此等現存的政黨提携，通過它而進於革命的運動（六）在殖民地的革命，不可急用共產主義之原則以解決土地問題，當用土地分配等小資產階級或改革主義的黨綱，但是不可將殖民地之革命指導權，給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之手；非努力宣傳共產主義之思想，作成勞農蘇維埃，仍然要與先進蘇維埃共和國努力而打倒全世界之資本主義。

列寧對於東方政策實施的老案既經如上述，今試觀察脫拉乾諾烏斯基（Trojanski）在「東方民族解放協會」提出實施東方政策計劃十九條，此項計劃至今猶為蘇俄政府所遵循，今試節錄如后：

（一）關於東方社會政治方面（I）目前東方被壓迫的國家，各自或明或暗的鬥爭，以企圖脫除外國資本主義的羈絆，而求到本國的自由與獨立，

本協會的設立，就於統一東方國家各個的鬥爭，以成功一種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2）爲達到以上的目的起見，惟有以勞動階級爲根據，以民族的國家底基礎，應建立在勞動階級之上，而不在於資產階級，民族自決的大任，非貴族及大地主所能擔當，因爲他們不願意帝國主義的消滅，並且不能夠以此事責望於智識階級，祇有農民、工人及手工業的勞動者，所以「東方民族協會」的方針及策略，應該注重於勞動者及被壓迫階級，且爲掃除內外兩方的專制政府計，應組織無產階級的羣衆，並造成一東方國際（3）東方民族紛歧，有各民族互爭的危險，或以一民族的強力併合弱小的民族，如日本帝國主義之類，爲避免這種危險起見，應使東方國際，在各民族平等權利的基礎上，臻於統一，此項國際組織應採聯邦式，由一國的聯邦，進而爲全亞洲的聯邦，（4）東方民族的對外解放與對內解放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東方的政治制度，應以人民的主權爲基礎，合民族自決與階級自決，以成爲勞動的共和國。

(二) 關於東方社會經濟方面——(5) 除日本及中國南部外，一切東方國家尙在前期資本主義時代，所以要求在東方實行歐洲式社會主義底條件，是不可能，不過勞動原則的政治制度，未嘗不可以實現，其前提有三：a. 東方的農業制度，仍爲原始時代的共產主義，b. 土地所有權的集中，c. 現時的國際狀態。(6) 東方的農業制度，以土地公有，大地主，貧農爲基本現象，所以東方的農民運動，應採農業的社會主義之方式。(7) 東方國家既以外國人爲大地主爲礦主爲廠主，一旦解除外國的羈絆後，應即以勞動階級取得政權，並組織經濟生活，所以外國資本主義的權力，既轉移到城鄉的無產階級，則內國的資本主義，也可以解脫，因爲國內資本主義既薄弱，則土地與土地富源，自然歸勞動階級享用。(8) 東方的革命已開始，西方的革命如俄國已經實現，所以東西革命有合而爲一的局勢，東方的文化技術，雖後於西方，未嘗不能免除資本主義的痛苦，由前期資本主義，而直達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質，在成爲國際的，可以合全世界而爲一，東方民族解放協會的社

會政治底立腳點，在以地上或地下的富力，奪諸私人所有或資產階級政府之手，而一切歸諸全國國民，至於歸諸全國國民的方法，當視其國情而定，（9）東方民族解放協會的經濟政策以天然的國際分工為原則，並且力求後進國農工業的發展，所以東方民族解放協會不採反動的口號，說什麼「亞洲人的亞洲」，祇承認自由交通的原則，其以文明方法開發亞洲富力者，咸招之使來，（10）東方富源的開發，不採用專買特權的方法，等亞洲於半殖民地或勢力範圍，東方民族解放協會認定自由競爭，使資本勢力雄厚技術優勝得以發揮其所長，本此方法發展運輸，開發富源，對於原料及工人與以相當的價格，不求有餘的贏利，東方國家此種經濟政策祇有與西方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發生關係，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急先鋒，僅有蘇俄聯邦不為自私自利的掠奪，但求雙方互利的交易，與各國自身的發達，東方民族解放協會承認資本技術勞動三種的自由競爭，而反對專賣與掠奪。

（三）立時採用的方法（II）為求東方全部對內對外關係之根本的

變更，應採用種種革命的行為，由一種革命機關立時宣告執行，（12）一切倚賴外國資本外國力量的東方國家宣告國債及戰債作為取消，凡為壓迫東方所費的金錢，不應由東方償還，東方民族對於鞭笞自己的工具，不應再償其代價，（13）一切鐵路及交通工具如郵政電報之類，即由外國資本所造成者，應撤銷外人之所有，而宣告為國民財產，（14）亞洲土地外人所得之一切專賣、特許及特權，概行廢止，（15）外國兵官與本國兵士所合成的武力主義，應行撤銷，本國兵士解散，外國兵官若帶有危險性應驅逐於亞洲之外，以上傭兵既廢除，以後為國防計，應代以全國義務民兵，（16）重利盤剝為東方人最苦痛的事，應代以國家或地方團體的無利小借款，（17）廢除一切間接稅，代以遞進率的所得稅，（18）亞洲土地採用自由貿易，輸出入兩項均免稅，故應廢止關稅及邊界上的禁令，（19）亞洲文化上的大敵，在於分全社會為各種卡斯特及階級，各人應立於平權地位，且各得自由發展。

綜觀列寧與脫拉乾諾烏司基兩氏關於東方的意義計劃，總算是十分精密的了，一九二三年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關於東方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共產主義者的職責；更有下列總原則的決定：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產主義者，有一雙方的責任：一方面力謀對於民主革命中的諸問題，作更澈底的解決法，即直接取得政治上的獨立；別一方面組織工人農民，爲其本階級特別利益而奮鬥，並利用民族主義的民主派之間的相互衝突而自取其利。」

我們由此尤可以看出蘇俄的東方政策，不獨是積極的利用東方民族爲敵對列強的工具；並且在消極方面「利用民族主義的民主派之間的相互衝突而自取其利」以「直接取得政治上的獨立」，使東方各民族受統轄於蘇俄勢力之下，這可以說是蘇俄「赤化」東方的鐵則了。

## 第四章 蘇俄民族政策與土耳其國民黨

俄國東方民族政策最大的目的，在剷除英國在東方的勢力，因為英國是白色帝國主義的領袖，在東方領有印度波斯埃及各民族的統治權；並且把中國及土耳其阿富汗等地，劃入其勢力範圍，所以俄國假使能夠取得印度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或中國的反英運動的聯合與同情，可以滅殺英國在遠東的勢力，動搖資本主義祖國的基礎，一九二〇年六月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鑒於東方各民族運動轟起，認為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因此決定統一東方的宣傳事業；同年九月一日蘇俄領袖季諾維夫在巴庫召集土耳其印度的波斯阿富汗等三十餘民族代表舉行最初的一「東方民族大會」，在大會中季諾維夫以第三國際代表的資格，極力鼓吹東方民族聯合抗英，他說：

「英國把波斯人當奴隸，把美索波他米亞、阿拉伯當殖民地，使他們的人民陷於饑餓，對於埃及的暴虐，比發拉阿時代尤甚，用鴉片毒害中國



的人民，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須先向英國宣戰，我們想得到最後的勝利，必須長久奮鬥到底。」

當時博得各民族代表熱烈的同情，而蘇俄政府的赤化東方的政策，也以這次東方民族大會為起點。

蘇俄這種反英政策的發動，最先是在土耳其，自大戰停止以後，德國在近東的勢力既已根本破壞，變為英國獨霸近東的形勢，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完全陷入英人掌握之中，當時英國的政治家，想乘戰勝的聲勢，併吞土耳其，并且想進一步攫得波斯，把馬爾馬拉海、黑海、裏海，以及波斯灣的管理權，通通握在自己的手裏；完成大英帝國唯一無二的海上霸權，於是利用希臘軍從士麥那登陸，侵入小亞細亞，在君士坦丁堡逮捕反英派的土人，放逐出境，土耳其民族的怨恨可知，卒因基瑪爾將軍與所領率的安戈拉政府的軍隊，經四年的血戰，把大不列顛帝國的代理人——希臘，在士麥那以上的勢力，掃蕩無餘，獨立組織新政府與國民軍，造成土耳其在國際上的新局

勢。

土耳其所以能夠有這樣的成功第一是土耳其立脚在被壓迫民衆勢力上面、土耳其國民黨便是被壓迫民族的羣衆勢力集合的中心勢力向來被壓迫在歐洲帝國主義宰割之下的土耳其民族、僅餘一息殘喘、只待帝國主義最後的一刀；可是土耳其國民黨在這種頹喪崩壞被宰割的殘局下、突然在安戈拉起事、組織新政府與國民軍、西拒希軍、東抗英軍、南戰法軍、卒能使俎上肉的土耳其有脫離帝國主義宰割的希望、這種事實最足以鼓勵各個弱小民族奮鬥的決心。

但是土耳其若沒有蘇俄的援助、仍然抵不住受英國援助的希臘底勢力、蘇俄想在近東打退英國的勢力、首先聲明「君士坦丁堡須仍歸土國所領有」博得土耳其人的歡心、使歷史上的敵人、一變而爲良友、一九一八年與土耳其結「回教解放同盟」一九二一年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更與蘇俄結重要的條約、宣布廢除國際帝國主義一切強姦三國的條約、蘇俄更與土耳

其單獨結「俄土條約」(一九二一年三月)、承認土耳其獨立並願與以幫助，所以一九二一年的希土戰爭，當時歐洲的評論家說是一表面上雖是希土戰爭實際是「英俄戰爭」，這話是不錯的。

蘇俄對於土耳其獨立的援助，雖有一部分成功，但是蘇俄政府若想乘機赤化土耳其，這是不可能的，第一土耳其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尤其在失了巴爾幹半島的領地，僅限於小亞細亞的地方，就是稍微帶一點新式意味的工業一點都沒有，所謂無產階級，自然不能構成一種階級意識，我們或者可說並無這種階級的存在，第二土耳其民族因受少年土耳其黨長久宣傳的影響，所謂汎土耳其主義(Pan-Turkism)與汎回教主義(Pan-Islamism)的觀念，深入于土耳其一般民衆底心理，加以土耳其在中古時代，回教文明曾放過一時的光輝，爲歐洲文藝復興的來源，民族的自覺心更是顯著，所以蘇俄在客觀的物質條件下，要實行赤化土耳其已是很難；但要拿共產革命，消滅土耳其民族的自覺心更不可能。

可是蘇俄政府最初決不顧慮到這兩層困難，列寧派認定土耳其新興的「國民運動」一派，是有聯合的必要，於是與土耳其國民政府結同盟條約，土耳其容納蘇俄的東方民族政策，俄國對於土耳其的報償，就是把以前的債權、領事裁判權及其他種種特權，一概拋棄，給土耳其精神上物質上莫大的援助；同時並派遣鮑羅廷等為土政府的顧問，使之參與帷幄，而鮑氏又儼然以「委任統治者」自居，等到蘇俄第一步援助土耳其獨立成功以後，便著手從事分化土耳其整個的民族運動。

本來土耳其國民運動的開始，其政治上的方針，實際和以前「少年土耳其」派差不多的帶着很強烈的民族自覺，一九二〇年一月國民黨領導下的新議會發布國民公約 (National Pact) 六條，其要義有二：(一) 土耳其為謀國家的進步與經濟的獨立，當有完全的獨立與自由。(二) 無論何國如有妄想加土耳其以任何不利者，土耳其人民一律予以斷然的反對，這就是說「土耳其是土耳其人的土耳其」，但是這種強烈的民族觀念，是為蘇俄

所嫉視的，他們一方面說土耳其國民黨是帶有一「資產階級性」，是少年土耳其的變形；極力攻擊「大土耳其主義」和「大回教主義」，竭力在民衆中間宣傳，說戰勝希臘及統一土耳其以後的國民會議政府，已經變成軍政獨裁的統治，土耳其的國民運動已經由左傾而右傾了。他方面則於國民大會中扶殖由農民手工業及智識階級組織的「哈勒絮摩臘」黨，在大會自成一系，用來作為監視國民黨的勢力，後來土耳其共產黨於一九二〇年成立，蘇俄政府又在背後指導操縱共產黨在君士坦丁堡和安戈拉等地非常活動，宣傳共產主義，常因此發生衝突，社會大感不安，國民黨首領基瑪耳氏特致書於土耳其共產黨首領蘇白希，下最婉切的忠告他說：「為救國起見，不得不預先防止過分激烈的要求，恐怕要損害國民的統一和對外的抵抗力，因此，土耳其國民大會認定在這裏實行社會革命，應該謹慎而且和緩的才是。」

在地方方面哈勒黨與共產黨依舊在民衆中間，宣傳激烈主張，想用種種方

法奪取國民黨在民衆中間的信仰，尤其是在洛桑會議後，土耳其因處在四面楚歌的外交環境中，爲避免國際孤立起見，遂不得不對摩蘇耳問題，表示讓步，但共產黨因此竭力加以攻擊，說國民黨已與協約國妥協，土耳其政府遂決定採取嚴厲的手段，以制服共產黨。一九二一年初，發現哈勒黨有背叛的陰謀，土政府遂因此將該黨解散；同時對於共產黨也實行通緝，蘇白希一家和幾個重要的共產黨領袖都逃向西部，鮑羅廷也被逐出走，俄土情勢，又日趨嚴重，蘇俄赤化土耳其的企圖，又完全失敗了。



## 第五章 蘇俄民族政策與印度的革命運動

其次，印度是英帝國主義在遠東的寶庫，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英帝國政府宰割印度，非常利害，使印度民族不堪暴力的壓迫，要求獨立熱望，在十九世紀的八九十年間，就已經萌芽，民族運動因之已肇其端了，不過當時的民族運動多帶文化的性質，所以無多發展，直到最近十年中，印度的民族運動，多帶有一「民粹」的性質，狂熱的鼓動人民起來排斥英貨，並且反對英帝國的「殖民地行政權」，以及其壓迫印度民族的種種行動，自此以後，印度的民族，已經在全國被壓民衆中，立了一個很穩固的基礎，英帝國主義爲維持其資本勢力的生存起見，對於印度的民族運動始終不會放輕；同時帝國主義的反響，反使回教徒與一般國民共同聯合反抗起來，一九一九年印度全國國民大會通過了最有名的「不合作」的議案，消極的表示不與英國政府合作，反抗英政府的審判、學校、法院；主張組織印度人民自己的審判、



自己的學校、和自己的法院、總而言之、印人要求組織自己的革命政府。

印度民族這種悲壯的獨立運動、不獨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使英帝國主義者發生恐慌；在他方面又是蘇俄東方政策發展的最好機會、列寧政府以爲印度的革命運動、一旦爆發、則此三億五千萬的印度民族、必定可以把它十五萬英帝國主義者驅逐出去、而建立東方革命的基礎、所以列寧斷定印度革命能夠成功的理由：第一是因爲印度是東方被壓迫民族唯一的工業國；現有工廠八千、勞動者達八百五十萬人、第二印度社會狀態、除一部分都會工業非常發達外、其餘地方現在都還在時代落伍封建狀態之中、所謂不滿於現狀的空氣、殆瀰漫於全國、第三僅以少數的十五萬英國人、握印度支配權、管理三億五千萬的印度人、因此國民的反英熱日益激昂、民族解放的機關、一天一天的成熟。

蘇俄既認定印度是他們的東方政策底中心點、首先便計畫了從近東中東方面、進行赤化印度的策略、蘇俄這種政策最初是從波斯著手、英俄兩國

在一九〇七年本來締結過波斯條約，劃波斯爲南北兩段，在均勢之下，各事侵略，等到一九一七年蘇俄革命以來，英國於一九一九年八月九日，又以強迫的手段，單獨締結英波條約，想把波斯底軍事財政交通各種權利，一概收爲已有，因之一時引起波斯人民的反感，蘇俄遂乘時以各種反英的口號，播得波斯人民的同情，同時莫斯科政府更採取援助波斯對抗英國侵略的政策，和援助土耳其一樣，向波斯政府聲明，把一切舊條約撤廢，舊借款取消，把北部波斯的駐軍撤退，帝政時代所獲得的租借權一概取消，蘇俄這種政策，不獨使波斯民族對俄的感情爲之一新，並可以使波斯民族對外的反感，集中於英帝國主義，俄國便可以乘這種反英高潮正盛的時候，取得波斯民族運動的支配權，侵入印度去。

同時蘇俄又想由波斯侵入阿富汗，本來阿富汗幾乎全在英國勢力範圍之下，英國對阿政策，向來是積極的，因爲阿富汗與印度接壤，爲英國保守印度對付俄國的前哨地，但是自一九一九年阿富汗國內的親俄派革命成功

以後，接著一九二一年俄阿條約成立，於是阿富汗又變為蘇俄進攻印度的前哨地；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俄國在阿富汗的勢力，逐漸增加，英國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經過三次大戰所培植的勢力，幾乎根本消滅，俄國的勢力，並且有由阿富汗侵入印度的傾向，英國因此感覺異常恐慌。

蘇俄勢力由波斯阿富汗南下，其勢滔滔，對於印度有直接威脅的局面。這種險惡的情勢，是英帝國主義者萬難坐觀的。於是英國外務大臣克崇特毅然的向蘇俄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蘇俄撤回駐波大使，與駐阿大使同年十二月又向阿富汗政府發了一道最後通牒，對於阿富汗政府大加恐嚇，結果仍就歸於無效，反因之促成俄阿西國之接迎，不過阿富汗民族還是生息在半封建的自足經濟制度之下，人民強悍好戰，蘇俄若是要在這方面進行其社會革命，自屬夢想，但他的重要的目的還在以阿富汗為進攻印度的前哨地，使印度邊境直感受了蘇俄勢力的脅迫。

蘇俄對於赤化印度的外交政策，既是如此。現在請進一步觀察蘇俄對

於分化印度整個的國民運動的進行，又是如何，本來印度的國民運動是以聖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爲首領，所以印度的民族運動，都惟甘地的「馬首是瞻」，甘地爲提倡「和平革命」的人，他所抱持的兩大主義：一是「非暴力主義」(Non-Violence) 二是「不合作主義」(Non-Co-operation) 「非暴力」與「不合作」兩主義爲印度獨立運動之兩大柱石，乃也是一件事物的兩方面，總括的說起來，不外是「消極抵抗」(Passive Resistance) 而已，甘地以爲這種「消極抵抗」的方法，實可以使印度的民族革命成功，甘地又根據他自己的主張，創定「不合作運動」的具體方法，經印度國民議會通過者，共計八項：(一) 拒絕一切英政府所頒給的官銜、爵位、及名譽的官職、(二) 戒絕飲酒、(三) 一切男女學童，不受英國教育，免爲外人奴隸、(四) 設立學校及大學校，以印度國語及手工業爲主要科目，以英語及其他外國語爲次要科目、(五) 排斥英國司法制度及英國式之法庭與律師、(六) 抵制外國布，復用印度土布、(七) 印人不再在英政府及不列顛軍

警行伍中服務（八）不納賦稅，自從這八信條提出以後，印度民衆努力的很多，不到一年，一般人民大率焚燬他們用外國布所製的衣服而以手搖紡車、自織粗布、英布輸入因之減少，棉織工業也大受影響，英國學校的印籍學生、人均減少百分之二十五；放棄官職爵位的人數，在二萬五千人以外，拋棄律師職務的更多，而訴訟之自法律撤回者凡數千案，甘地所領導的民衆運動，一時如水如茶，竟使英國政府有窮於應付的形勢。

我們試一考察甘地所以能夠鼓動印度民衆這種偉大的民族運動，實有他產生的背境。第一有英帝國主義者長久宰割印度民族的歷史，使他們非努力起來爲民族獨立不可，甘地不過這種傾向的領導者，第二印度民族在世界上是最高於宗教性的民族，人民的宗教觀念最強烈，甘他所持的非暴力主義，是根於「愛的宗教」而來，甘地自稱「這種消極的抵抗力，就是謂所「真理之力」（Truth-Force）也就是托爾斯泰所謂「精神力」或「愛力」（Love Force）推而至其極，這種抵抗力實是離開金錢或其他物質的

助力而獨立的「第三、英帝國對待印度，是以經濟的侵略為主，甘地所以有「紡機」救印度的主張，就在以經濟絕交的手段，為制英帝國主義者的死命。

在他方面印度這種帶有狠濃厚「國粹」色彩的民族運動，在蘇俄共產主義者看起來，甘地主義者乃是托爾斯泰一流主張無抵抗主義的集團，他們反英運動所採取的手段，只局限於經濟絕交一種，絕對不主張用武力排斥英國在印度的勢力，這對於蘇俄共產主義者「以暴動奪取政權」的主張，大為不利，所以他們宣傳印度的甘地運動，說是不是民族的革命運動，乃是復古的反革命的運動，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列寧常常招集印度革命的志士到莫斯科去，和他們連絡，蘇俄要拿到印度民族運動的指揮權，首先在打破由甘地領導的統一的民族運動，所以他們首先在企圖消除印度民衆對於甘地的信仰，高唱「印度甘地主義落伍了」的口號，其次則號召印度的無產階級，使他們從「甘地運動」中分裂出來，造成異軍獨起，直接接受蘇俄

的指導。

果然自一九二二年甘地入獄以後，印度的民族運動便成分裂的形勢，在主持民族運動的主幹——印度國民會議中，很顯然的有各種新派的分立，在馬行拉特拉 (Maharashtra) 拜落 (Bihar) 及中部各省，這些地方國民會議已有反對甘地主義的呼號，他們要求改訂「建設綱領」甚至有主張把以前國民大會的議決案根本取消，一九二二年六月間他們又在聯合省奧克羅 (Lucknow) 地方所開全印度國民大會，會議中發表上述意見，引起大眾的注目，所以印度的民族運動在甘地被捕以後，已經發現裂痕了。

但是蘇俄在實際上對於印度赤化的進行，仍是毫無結果，共產黨關於赤化印度的工作，在精神上與物質上雖蒙了不少的犧牲，可是這種犧牲，還是沒有多大的效力，結果蘇俄在印度仍不能推翻英國的勢力，這是因為「甘地運動」是一種純粹的民族運動，這種運動仍是以甘地主義為中心的，印度民衆之信仰甘地，決不因少數人的反宣傳而失墜；換句話說，印度民族

運動實是以甘地爲正宗的，當印度民族運動正在激昂的時候，英殖民當局以爲捕了一個運動有力的首領，便可以消滅一切的運動，那曉得印度民衆反因甘地的被捕而愈趨於激昂，當甘地在獄中時，一般民衆都爲他齋戒祈禱，甘地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八日入獄，民衆便以每月十八日爲他的紀念節，同時「甘地在獄中哩」的呼聲充滿了印度，「Mahatma」呀！你要自己保養呢！你是這世界上能了解我們的唯一的人，你要是死了，誰來指導我們呢！」的祈禱，遍於全印人民的口頭，但後來英政府鑒於印度民衆情勢的嚴重，不得不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赦免，我們由此可知印度民衆對於甘地信仰之堅與不合作黨勢力的深厚，益足以驚人，甘地主義既這樣在印度民衆中立了一個堅強的基礎，實是蘇俄赤化印度的最大障礙，到後來達斯率領的自治運動 (Separatist Movement) 又繼不合作運動而起，於是印度的民族運動又落於資產階級的手裏，而使印度的革命，越發右傾，蘇俄欲有所操縱於其間已是不可能的了。



其次蘇俄所認爲最有希望的印度勞動階級，在人數上雖然很多，但是大半沒有教育，階級意識與團體的組織都很幼稚，尤其缺乏政治的訓練，全印度職工大會雖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開了一次會，沒有多大的結果，雖然有幾次轟轟烈烈的罷工運動，但是結果總是妥協，其原因都是由於工人缺乏智識和組織，農民方面也是一樣，所以蘇俄所恃以爲赤化印度的主力軍既是如此，對於他們政策施行上自然是更加困難了。

此外英國統治印度的政策，又非常老練熟達，他寧肯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地方對蘇俄讓步，而對於印度則觀爲禁地，決不任蘇俄染指，要知印度是英帝國在東方的寶庫，一旦他的寶庫易主，大不列顛帝國的生命便不能久長，在這赤白交鋒下的印度民族運動，真是千鈞一髮的危機！今後英俄在印度仍在各鬥法寶，印度民族的獨立運動，更不知何日可以成功。

## 第六章 蘇俄赤化蒙古之猛進

「蒙藏問題」久成爲我國內政上一樁重要的問題；同時又是最重要的外交問題，國人因蒙古西藏遠處邊陲，所以對於「蒙藏問題」向來沒有人加以重視，徒任俄英赤白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中英西藏問題，既因國內政象混亂，始終沒有得到適當的解決；而蒙古近年以來恃蘇俄的援助，對於我國的關係，若即若離，更因蘇俄勢力南下脅迫，勢將使外蒙古逐漸由共產化而成爲蘇維埃俄羅斯聯邦之一員。年來國人怵於中國共產黨之宣傳，對於「蒙古」問題的真相，十分模糊。以前國人對於外蒙古多抱一種不可思議的觀念，不是妄談如何經營，完全視爲殖民地；便是視如猛虎，言之色變，後來中國共產黨又張大其詞，幾認蒙古爲蘇俄之屬地，但是無論如何蒙古總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我們之看待蒙古完全與看待內地行省一樣，既無不應以屬地視蒙古，尤不能任蒙古人民受蘇俄之宰割，所以我們若是

要求外蒙古問題，有適當的了解，必須明瞭蘇俄侵略蒙古的政策，因為目前外蒙古的一切政治組織都是受蘇俄的指導，所謂蒙古共和國實際上已變成爲蘇俄的屬地了。

蒙古本是一個極廣的在高原的平原，版圖極廣，東自中東鐵路，西自東土耳其斯坦山地，北自南西伯利亞，南至西藏山之發源地，這個平原有些地方是山林；有些地方是滴水寸木都沒有的沙漠，蒙地河流極少，雨水不足，氣候乾燥，所以蒙古彷彿是天然的一個牧畜地方，迄於今日蒙古人民仍以牧畜爲唯一的經濟條件，蒙古民族是屬於喀午一系，而共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其歸向的中心，所以能自成爲一體，較他處蒙古爲有團結力，滿洲入據中國經過長久的爭鬥，一六九一年取消了蒙古政治上的獨立，在蒙古分封了許多王族，這些一直到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時又把蒙古分爲內外蒙古，外蒙古即西北蒙古，接近俄國邊疆，由喀爾喀及科布多所組織的，內蒙古則聯合東南的各王族，并加入新疆及中國西部各省，北京清政府曾漸漸得

過蒙古王公的好感，增加王族的人數，取消大封建制度的總轄；並且對於蒙古人民表示親善之意，此外清政府使「汗」及小王族的權利都一律平等，而對於大的王公，則用種種獎賞爵位及嫁以公主等事去賄買他們，因此這些王公都成爲清政府有力的瓜牙，蒙古人民受剝削不堪，人心因之離散，後來武昌革命事起，喀午喀各汗王公喇嘛，乘時舉行秘密會會議，共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君主，驅逐滿清官吏，宣布獨立，建設蒙古帝國，辛亥革命後民國三年與民國五年間中蒙訂立兩次條約，蒙古仍爲中國的領土，但因爲歷屆北京僞政府誤認蒙古爲藩屬，北洋軍閥嘗於本部失却地盤時，便作些無聊的經營外蒙古的計劃，空發布設官置吏的政令，加重蒙人的惡感，民國九年徐樹錚占領庫倫，強迫外蒙古軍隊解除武裝，引起蒙古人民對於中國的反感，因此給蘇俄政府以侵略蒙古的大好機會。

本來外國對於蒙古的侵略，以前是日俄同等進行，舊俄政府時代早就想侵入蒙古，自一八六〇年以後，俄國商人先從阿爾太山烏梁海到了西蒙古，

以後俄國在外蒙古的勢力，就逐漸發展開來，俄帝國政府知道蒙古是一個好市場，撞命的想來侵略，日俄戰爭以後尤其利害，俄國最注重烏梁海邊境，因為那個地方天然條件，是蒙古最宜於農業的地方，十九世紀的八十年時代俄國就已認定烏梁海是他殖民政策的目標，一九〇九年以武力侵犯，在該地設立行政機關，日本自一九〇四年到五年戰勝俄國後，南滿東蒙劃入其勢力範圍，東亞的門戶大開，蒙古天然鑛產原料非常豐富，於是蒙古更受日本的侵略，日本政治經濟勢力，不但由南滿鐵路侵入東蒙，而且逐漸潛進於蒙古其他區域，日俄戰後「侵略蒙古」已經成了遠東問題中緊要的一個，蘇俄對蒙的侵略政策，完全是襲用帝俄時代的故智，積極進取致使日本侵略蒙古的進行，不得不歸於失敗，而帝俄時代一年緊一年的侵略外蒙古的政策，至此完全實現了。

蘇俄政府何以能夠達到侵略的目的，第一個原因就是由於中國政府對待蒙古的失策，以前滿洲政府對待蒙古完全採用一種愚民政策；同時更

以蒙古爲他們封建王公的外府，使蒙古民族受壓迫不堪。民國成立以後，北京歷屆僞政府，仍然以統治者的態度對付蒙人，絲毫不能開誠布公，這是使蒙古容求助於蘇俄的最大原因，其次在地理上蒙古與蘇俄的西伯利亞接壤，交通又非常方便，而且在西伯利亞境內住了許多與蒙古同種族的民族，俄蒙關係，因之很是接近，在他方面因爲蒙古南部有一帶大沙漠，與中國本部隔絕，而中蒙的關係且日益疏遠了。

蘇俄政府對待蒙古的政策，與帝俄時代是一系相承的，蘇俄最初侵入蒙古，是在民國九年，當時白黨領袖謝米諾夫占領庫倫，想以外蒙古爲舊黨復興的根據地，蘇俄赤軍於是藉進剿白黨爲名，自恰克圖攻入外蒙古，乃於是年七月初，赤軍完全剿滅白黨，佔領庫倫，因是在完全中國主權之下的外蒙古，竟由白黨手中而轉移到赤軍勢力控治之下了，蘇俄赤軍佔領外蒙古之後，乃着手煽動蒙古人民企圖在赤軍勢力之下，建立一徒擁虛名之蒙古獨立政府，本來在赤軍未入外蒙古之前，蘇俄政府曾在上海丁斯克及伊爾庫

次克等地方，招集許多蒙古的亡命客組織蒙古國民革命黨，更以自西伯利亞來底「蘇俄化」的蒲里亞（Beria）人冒充蒙古人，每逢蘇俄欲利用蒙古的代表時，彼等就常充蒙古人的代表，蘇俄外長齊采林暗中嗾使以前庫倫俄帝國總領事署的一個小書記名波多（Bodo）（後為蒙古政府首領）的在赤軍佔領恰克圖時，請俄政府派兵到庫倫，保護蒙古自治權，因此之故蘇俄赤軍乃借贊助新蒙古為名，進兵到蒙古，而所謂蒙古獨立政府便於民國十年三月十三日宣告成立。

蒙古獨立政府的成立，可以說是完全是蘇俄援助成功的，所以當民國十年蒙古發表獨立宣言的時候，蘇俄政府就首先承認，不久兩國政府各派遣全權的代表，於民國十年十一月五日在莫斯科，由雙方代表締結俄蒙修好條約，這條約的內容共十三條（一）蘇維埃聯邦政府認蒙古國民政府為蒙古的唯一合法政府。（二）蒙古國民政府也認蘇維埃聯邦政府為俄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三）兩締約國負有左列之之義務：甲兩締約國

無論何方之領土內，不許有「以反抗他方或顛覆其政府爲目的之團體及個人」存在，同時不許「以與他方戰爭爲目的之軍隊」在自國民內動員或募集義勇兵，乙不許輸入武器或從其領土內通過於「與締約國直接或間接爲戰爭行爲之團體」，（四）蘇維埃政府派遣全權代表駐蒙古首府，派遣領事駐科布多、烏里雅蘇臺、阿魯頓蒲魯伊克（即恰克圖），及其他之都市，（五）蒙古國民政府派遣全權代表駐蘇俄政府之首府，派遣領事於與蘇俄協定之俄境各地，（六）俄蒙間之國境，宜於兩國政府間特定之委員會定之，（七）各締約國國民居留於締約國地方之領土內，享有最惠國國民之權利與義務，（八）各締約國之司法權，無論關於民事或刑事，在其領土內，適用於締約國他一方的國民；但基於文明與人道之原則，兩國皆不適用體刑，兩法在執行刑法上之審判及判決，若對於其他三國與以特典時，此特點亦宜自動的適用於締約國他一方的國民，（九）由兩締約國之他一方輸入或輸出之貿易品，宜納法定之關稅；但此等關稅率，不得超過「



由其最惠國國民所徵之關稅、(十)蘇俄政府對於存在蒙古境內的俄國所有的電信局及電信裝置、無條件的讓與於蒙古國民政府、(十一)爲增進兩國間之文化及經濟關係計、俄蒙間郵便電信之交換、及經由蒙古電信問題之解決、皆爲重要、兩國對於本問題宜特行協定、(十二)蒙古國民政府、對於在蒙古境內、所有土地及建築物之俄國國民、宜與以適用於最惠國國民同樣之土地所有權及賃借權；但俄國國民對此宜負擔徵納法定租稅及賃貨之義務。(十三)本協約以俄文及蒙古文作成兩則、從簽名之日起、發生効力。

從這條約表面上看起來、俄蒙是在平等的原則上結合、但是實際上蒙古的政治全由蘇俄人員主持、蒙古的各機關須各加聘一俄人顧問；一切實權、概爲俄顧問所掌握、並由紅軍軍官編練蒙古軍隊、向來依附中國的蒙古王公已失其統治的勢力、政權全在蘇俄的代理者——蒙古青年革命團——之手。

蘇俄除在形勢上與蒙古結互惠修好的條約之外，更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二月二十日由莫斯科政府與號稱外蒙的代表訂結密約如下：

（一）外蒙當局須宣告一切森林鑛產及土地以後均歸國有，凡無人佔有之土地，均給蒙古貧民及俄國農民居住耕種；（二）外蒙天然富源，禁止私有；一切森林鑛產許俄國實業家雇用蒙人開採；（三）全國鑛業，歸俄國工團及工會承辦；（四）貴族享有之土地權，當即廢止；代以蘇維埃自由交易財產制度；（五）聘請俄國實業家，開發富源，振興工商業；（六）請蘇俄工會，參與創設勞工制度事宜，以便得完全保護工人；（七）聘請俄國專門家，入外蒙政府以資指導；（八）依蘇俄政府之通議，外蒙政府一切職權，均歸人民政府之行政部施行，先設立一革命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再召集議會，以便制憲；（九）允許蘇俄軍隊駐紮於外蒙，協助蒙人保全領土，以禦中國；（十）活佛及蒙古王公之頭銜，一律廢除，以活佛為革命委員會委員長。

由這種密約內容看來，蘇俄政府已簡直把蒙古劃為他的屬地，一切內政都受他的控制，比較舊俄政府時代的俄蒙商務專條，還是利害；而蘇俄侵略蒙古的計劃內幕，已全在密約中狠具體的說出，由此可見蒙古在蘇俄政府的勢力控制下，已失去獨立的地位了。

蘇俄在蒙古獨立以後，所採取的策略，可分兩種：就是在蒙古境內組織一強固的青年革命團；同時又煽動蒙古與中國脫離關係，前者是蘇俄對於蒙古政府一種重大的監視，後來則完全是包藏禍心，認蒙古為其囊中物。

本來蒙古的獨立運動，最初是由國民革命黨為中心的，國民革命黨最初是由蒙古的貴族和喇嘛僧來主持的，這些貴族和喇嘛僧何以能主持國民革命黨，也是因為蒙古的平民大半缺乏智識，不能担荷「組黨」的工作，所以蘇俄不得不暫時利用這般人，但是這般人思想狠舊，不能把黨的進行向前去，容易發生反動；於是，不久蘇俄又招集逃往俄國的一般蒙古下級官吏的子弟，他們都是青年，思想又狠左傾，所以把他們集合攏來，組成幹部，這

就是後來握有政治上實權的「蒙古青年革命團」。

這個青年團的組織是和俄國共產黨青年團相同的，他不受蒙古國民黨的指揮，直接與蘇俄發生關係，站在蒙古政府和黨的後面，處於監視和指導的地位，防止蒙古的政府和國民黨為舊思想所拘束而有反動的傾向，他們在恰克圖和庫倫等處成立幹部，作成一種最徹底的赤色青年團，為蒙古最左傾的團體，團員在三千人以上，一九二二年一月遠東青年大會在莫斯科開會時，他們也曾派遣代表，前往列席，報告蒙古政府的態度，同年七月該團在庫倫開第一次全體代表大會，通過一種宣言，說明該團的目的，在「把蒙古國民從外國資本的壓迫下面救了出來，確定蒙古的獨立，然後由無產階級羣衆，建設一種使自己經濟反文化生活向上的政治制度」，同時該團又聲明「本團對於國民黨，當與以援助，但本團務為無產階級羣衆的機關，所以在組織上及政治關係上，務須確保本團完全獨立的地位，可見蒙古青年團與蒙古國民黨的關係，是不相統屬的。

蒙古政府成立之初，因為蒙古政治人材大少，不得不以蒙古貴族及資產階級有力人員來充當，所以最初主持蒙古政府領袖一個是喀爾喀王接尊漢（又為蒙古國民黨創始者）；一個是由喇嘛僧出身的賀圖（為蒙古政府的總理），這不過是蘇俄政府把列寧的策略在蒙古又來一下，所以等到革命的基礎鞏固以後，蒙古政府又如「克倫斯基」政府一樣，又來一個政變，把舊日所利用的舊執政者，實行一個大肅清，於是蒙古獨立政府最初由舊支配階級出身的一般領袖，一個一個的被驅逐或屠殺，如是政府已漸成「赤一色」了，同時在黨方面又由蒙古革命青年團在背後指揮，把貴族喇嘛出身的領袖及右傾的分子驅逐，黨員也淘汰出一大半，結果國民黨也成功「赤一色」了，這是蘇俄對於蒙古內政的收服，第二步的成功。

其次，蘇俄在策略上，又不得不煽動蒙古與中國脫離關係，因為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蘇俄非使蒙古脫離中國不可，這個計劃具體表示的是蒙古政府成立後，曾致電蒙藏院說：

「我蒙古政府實無隔閡之事，惟望中國政府早息內爭，共籌脫離列強侵佔之策，實行真正共和，民國政治改良，以謀四萬萬同胞享受平安幸福，或實行民族自決辦法，亟待中政府明令宣布，若將此項明令頒發之後，我蒙古政府當派全權代表，馳赴中央，共議中蒙多數人民永享平安之計」，其中的話，雖似正大；但其用意固咄咄逼人，中蒙關係，也就成爲「若即若離」的形勢，後來蘇俄的軍官，並指揮科布多的蒙兵，侵入我國新疆省阿山道屬布爾根流域，北京政府是時雖與俄國一再質問，而俄方則諉爲不知，其實蘇俄的用意是想擴大外蒙古的範圍，在他們計劃中不但阿爾泰山道區各蒙旗收歸外蒙，就是天山以北的迪化伊犁塔城等處也應收歸庫倫管轄，更加大蘇俄赤化我國西北的勢力。

全部的看起來，蘇俄侵略蒙古，全是積極的，他不僅在軍事與政治上運用其策略；而且在經濟與文化上，尤其利害，就是貿易一項而論，蒙古貿易年額，現在有三成，在蘇聯的貿易機關手裏，有三成在蒙古中央，「生產及消費

「組合」之手，其他的蒙古和外國機關，合共不過占有四成，蒙古「生產及消費之組合」機關的發達，大都是取法於蘇聯，在蘇聯所派遣的貿易顧問指導之下，現已開設了這種組合機關共有一百二十餘所，而蘇俄對於蒙古最大的侵略，便是交通方面，兩年前曾宣傳蘇俄與蒙古已成立一種鐵道七線布施的契約，這種消息雖不知真偽如何？但蘇俄確有在蒙古敷設鐵道的計劃，據最近所得消息，蘇俄在遼東已決定築路，一由諾烏歐至科布多，現測驗已告竣，定六年內完工；一由上烏金斯克給恰克圖以進展到庫倫，則前說不謂無因了，又去歲蘇俄革命十週紀念日舉行的重要會議中，已通過的議案第二條中有一「於今春中東理事會所決定敷設之中東路培養線外，更敷設（一）從穀類產區之三吉達於本線之線，共伍百十俄里，（二）至蒙古之幹線展長三十俄里，（三）連結安達與蒙古之架線延長百三十里俄里，由此更可知蘇俄對於外蒙經濟的侵略，是十分積極的。

在文化方面，蘇俄對於外蒙人民智識的啓發，與共產主義的宣傳活動尤

爲積極、外蒙政府曾組織自然地理學會，蘇俄政府予以援助，派柯資諾夫氏爲顧問，起草該會會則草案，並於會務進行，有直接過問之權，又在蒙古發掘漢人墳墓，尋出多數古代武器、家庭用具及碑碣等，此外尚有文學記錄，於歷史的研究上有重大的價值，此等物品都爲俄人搬向莫斯科去，後來外蒙政府起而反對，發掘事業才因之終止，不過蘇俄在外蒙古的文化侵略，已漸次收獲效果，蒙古青年因受蘇俄的宣傳，多熱心傾向共產主義，在蘇俄留學回蒙的青年，宣傳共產主義，尤爲激烈，他們多組織赤化學術團體，從事活動，蒙古首都庫倫，尤爲盛行。

中國方面對於蘇俄這種破壞我民族聯合的陰謀，自然不容坐視，民國十三年北京政府與俄使加拉罕結中俄協定，依該協定的第五條「蘇俄政府承認外蒙古完全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並尊重對於該領土的中國主權，蘇俄政府駐在外蒙之軍隊，俟依本協定第二條所定「關於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治安辦法會議」之商定時，即聲明由外蒙全部撤兵」，這協約中固明



夕承認「外蒙古完全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在理應該撤消「外蒙古獨立的承認」，可是蘇俄對於前面所述一九二一年俄蒙修好條約，依然有效，并不曾取消，這是蘇俄對於蒙古事件最矛盾的，後來俄使加拉罕向北京政府通知撤盡外蒙俄兵的兩個月以後，忽有俄軍官指揮指揮外蒙軍隊，由科布多侵入我國新疆省阿山道屬布爾根河流域的事情發生，則蘇俄更無以自解，而其積極侵略外蒙古的野心，更由此可見。

自去歲本黨實行清黨以後，鮑羅庭被逐逃回，蘇俄政府更嗾使鮑氏由俄入庫倫，力圖外蒙古之徹底的赤化，是則蘇俄侵略蒙古之野心，猶未嘗稍斂，鮑氏對人宣言「第一計劃之失敗，爲予之大經驗，予之計劃定不失敗」。所謂第一計劃之失敗，就是鮑氏年來對於本黨之陰謀暴露，引起全國民衆一致的反對，結果鮑氏狼狽逃走，現在所謂第二計劃就是陰謀內外蒙古同時赤化，可見鮑羅庭爲禍我民族之鬼計，猶未中止。

鮑氏前在庫倫，一方面使外蒙古徹底的歸服俄國，同時進行內蒙赤化的

計劃其內容分爲三大項（一）擴張軍備，以武力威攝內蒙古；（二）用種種宣傳手段，引起內蒙古對於中國之反感，助長其叛亂；（三）建築由外蒙至內蒙之鐵路，此項交通機關，有兩種必要；第一可以便利蘇俄及外蒙古的軍事行動，第二交通發達，則兩地人民之接觸，必極容易，可以普及赤色宣傳的勢力，除上述各種計劃之外，鮑氏又著手聯絡內蒙古國民代表大會，要求外蒙政府連派代表至內蒙，聯絡內蒙古國民代表大會，這個代表大會，是在一九二五年成立，由內蒙古的留外學生及一般智識階級發起，內蒙的六盟，五十一旗，及特別行政區域都派代表參加，勢力頗爲強大，大會的目的，仍以中華民國的資格，力謀蒙古民族之向上的發展，以副五族共和之實，始終不願脫離我國的關係，現在鮑羅庭欲想拿陰謀手段，利用內蒙古，其用心固狠險毒，但亦徒見其弄巧反拙而已。

總括的說起來：內外蒙古是中華民國領土一部分，又是北方邊陲的屏蔽，蘇俄派兵以武力侵佔蒙古，很顯然的是侵犯了中華民國的主權，而且

對於蒙古種種的陰謀，也直是對我民族一種威脅，蘇俄政府這種武力強佔他民族領土的行爲，尤其是帝國主義最醜的暴行，他一方面與中國訂約承認蒙古爲中國的領土；同時又承認外蒙古的獨立，這種陰險詭謀，更是滑稽，我們相信蒙古應在中華民國的政治上，應有平等生存的獨立權。但對於蘇俄這種宰制蒙古，欺騙蒙古，以及離間我民族的行爲，是絲毫不能坐視，我希望大家留意蘇俄侵略蒙古的陰謀與蒙古最近的情狀，使蒙古民族得從蘇俄的暴力下解放出來，以實現孫先生民族平等建立中國的主張。

## 第七章 蘇俄對華政策之歷史底觀察

蘇俄政府的東方民族政策，初僅在土耳其、波斯以及阿富汗等近東及中東諸國，最後便伸其勢力到中國來，於是我國遂成爲蘇俄東方民族政策的中心。蘇俄最初對於我國實行侵略，是從外蒙入手，上章已將蘇俄藉進剿白黨以兵力強佔外蒙古的詳情加以敘述。不過當時還沒有積極的侵入我國本部，這是因爲第三國際當時是季諾維夫主其事，季氏是一個革命西進論者，自始就沒有置重於東方的煽動；同時又因爲正在進行中東的煽動，所以注全力侵略我國；等到後來蘇俄赤化中東的政策失敗以後，便不得不以中國爲他們東方政策活動的最後舞台。

蘇俄對華政策，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蘇俄表示與我民族親善，一方面和我國民共棄的北京僞政府，結訂所謂中俄協定，取消不平等條約；他方面又甘言密語，嗾使中國共產黨加入本黨，以爲取得支配中國

民族運動的開端。第二時期便是製造左右派等名目，企圖分化本黨，破壞本黨的統一，而實行其所謂『利用民族主義的民主派之間的相互衝突而自取其利。』的詭計。第三個時期就是明目張胆的竊奪本黨統治下的政權，企圖建立所謂蘇維埃政府。這三個時期中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行動，都可以看出他背後主人對華的陰謀。過去共產黨在本黨以內的搗亂的行爲，又無一不受蘇俄的指使，這都是種種事實可以證明的。

蘇俄最初對華政策，是一種『欲取先與』的政策。蘇俄政府對於我國本部的赤化運動，是以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爲開幕人物。一九二〇年末到一九二一年夏間，他在北京勾留了半年，專從事下部的宣傳。至於與北京偽政府開始交涉的還是越飛和加拉罕兩人。加拉罕在一九一七年署名發表了一向中國極表好意的宣言，這篇宣言是蘇俄政府對華政策出發的第一步。這篇宣言的內容，現在把他節錄如下：

『今日勞農政府之軍隊，已將特外械外餉之苛而恰克專制背叛革命

之軍隊撲滅，已達西伯利亞，並與西伯利亞之革命民衆聯合。故人民委員會行政部，特向中國人民，作下列之博愛忠言：

勞農政府之俄羅斯，及其赤軍，已戰鬥二年……今向烏拉大山之東進行者，並非壓制亦無奴民奪地之心。……吾儕今願以自由之權給與各地人民，使東方各民族，得能脫外族強權，及外族金錢壓制束縛。中國民族，即此等被壓迫民族之一。……故請將我儕自一九一七年十月大革命以來，從未能於宣告而被出賣於歐美日本之報紙秘匿不宣之事，再普告於中國人民：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勞働農民政府執政以來，乃屢次以全俄人民之名義，致書於全世界之人民，力勸伊等建立耐久之和平。此和平，應以彼此放棄侵佔他人土地，及放棄吸收他人金錢爲基本。所有民族，無論或大或小，無論任何地點，無論是否自由，或在他國強權壓制之下，均應在內部生活上，完全自由。任何權力，不應從而羈束之。吾勞動政府，

又曾續行宣言：將從來俄國與日本、與中國、及與從聯盟各國所訂結之一切秘密條約、概行作廢！因此種條約、實為俄皇政府及其聯盟各國、力侵利誘、壓服東方各民族之機械。其中以中國民族為最。得其利者、僅各資本家與地主及俄國高級軍官而已。

吾勞動政府、曾邀請中國政府、即開談判、磋商廢棄一八九六年之條約、與一九〇一年之北京草約、及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與日本訂結之一切協約。簡言之：即將俄皇政府自行侵奪、或借日本及其他聯盟國公共侵奪之中國人民所有者、一概歸還中國人民。此項談判、開至一九一八年三月為止、斯時協約各國、突扼北京政府之吭、廣用金錢、收買中國官吏及報紙、拒絕與俄國勞農政府交涉。而日本與協約各國、不待滿洲鐵道之歸還中國人民、即羣起佔之以為己有。並侵入西伯利亞、而強迫中國軍隊、公共出兵、公同作為此項可駭而有罪之強盜行為！……

吾儕特致書於中國人民，望其明瞭勞農政府，曾聲明放棄從前俄皇政府向中國奪取之一切侵略品，如滿洲及他種地方是也。……

勞農政府願將中國中東鐵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金產、及他種產業，由俄皇政府及克倫斯基政府及霍爾瓦特謝米諾夫苛而恰克等賊徒，與從前軍民商人，及資本家等侵佔得來者，一概無條件還中國，毫不索償！

勞農俄國放棄中國因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而負欠之賠款。本政府所以不能不三次宣言及此者，因吾儕雖屢次宣言放棄，而此項賠款，仍由協約國徵收，以接濟北京舊俄帝國之使臣，駐在中國各處之舊帝國領事館人等之濫用。此等俄皇之奴隸，其全權早經取消；而伊等仍僭守舊職，並以日本及各協約為奧援，驅慌中國人民。中國人民，不可不知此事；並應將此等誑人騙徒，全行驅逐出境。

勞農政府廢棄各種所有特別權利，及俄商在中國地面上佔有之一切



租界地；任何俄國官員及教士，不準干涉中國事件，如伊等犯罪，應照中國法律受地方審判。在中國地方上，只能有中國人民之權力及司法，不能有他種權力，或他種司法。

在以上各重要點之外，勞農政府並願即與中國人民談判，與其全權代表公同斷結所有俄國政府從前偕同日本及協約各國所作之一切強暴及不公平之事件。勞農俄國深知協約各國及日本，此次必再竭力使俄國勞動家及農人之言語，不克達於中國人民，俾中國人民不知欲收回被奪之產，須先與滿洲及西伯利亞之侵佔人了結。因此勞農政府，今特通消息於中國人民。……如中國人民以俄國人民為榜樣，願恢復其自由，并避免協約各國在凡爾賽斯（德約）為之代定之命運，使之為第二高麗，或第二印度者，則紛爭自由之時，舍俄國工人農民及其赤軍外，更無他同盟國及他兄弟可尋。

勞農政府，今以中國政府間接邀請中國人民，即與吾儕建立正式交涉，

並即派遣代表來我軍前。

一九二〇年，蘇俄又來了一個宣言，內云：

「查去年七月二十五日，本部曾向中國人民及南北政府披露宣言，內稱從前帝制時代與中國所訂各種條約，現俄政府概行辭退。至帝國政府與資產黨前在中國所侵掠者，亦一併交還中國人民。並請中國政府開始談判以定邦交等語。茲聞此項宣言，貴國政府已經收到。

各界人民、各機關、極願貴政府與我國開始談判，以定中俄兩國之邦交。貴國政府已派軍事代表張中將斯摩來莫斯科，我等不勝歡迎，並願與貴國代表直接談判，由是彼此可以了解兩國公共之利益。且我輩深信中俄兩國將來所解決各種問題，無不與兩國互有裨益。……惟迄今未奉相當之訓令以證明俄民族之友誼，而為從速和好之障礙，殊為可惜！和好遲延，因而兩國政治商務諸重要利益，不能實行；本部願助兩國和好速成，特聲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勞農政府宣言內

所載之原則，本部堅持不變。並以之爲中俄條約之基礎。本部爲闡發宣言書內所載之原則起見，特將中俄協約各主要條款以爲兩國利益之所必需者，送請貴部查照：

(一)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外交委員會聲明中俄原有條約概爲無效。所有中國土地之侵略，及俄國在中國之租界，概行辭退。并將俄國帝制政府及俄國資產黨前在中國所侵掠竊取者，一並永遠無償退還中國。

(二) 兩共和國竭力設法，從速規定兩國商務上實業上之關係，然後訂立專約，雙方遵守最惠國待遇之原則。

(三) (甲) 所有俄國反對革命黨之各機關、各團體、各個人、中國政府，應不予以援助，並不准其在中國領土內有何舉動！

(乙) 本約簽字後，所有中國領土內反對勞農政府之軍隊各機關，或反對勞農政府之同盟政府者，中國政府應解除其

武裝、隨同其財產、一併交與勞農政府接收。

(丙) 勞農政府、關於反對中華民國之各機關、各個人、亦負同等義務。

(四) 旅華俄僑、應遵守中華民國一切法令、斷不能享受治外法權；旅俄華僑、亦應遵守俄國一切法令。

(五) 凡在中國自稱俄國外交代表、領事代表、未有本國政府之委任狀者、中國政府、應自本約簽字後、即與斷絕關係；並驅出華境。

原有俄國公使館、領事館及其財產案卷等、應亦交還本國政府。

(六) 勞農政府、辭退庚子賠款、但中國政府、無論如何、不能將此款轉交俄國領事、或要素此款之某人、或俄國某機關。

(七) 本約簽字後、中俄兩國、互派外交代表、互派領事。

(八) 關於勞農政府利用中東鐵路一事、中俄兩國、允許專訂條約、將來訂此約之時、除中俄兩國外、遠東民國（現已併入蘇俄）亦可

加入。

以上所列主要各條，可與貴國代表和衷商議。倘中國政府認爲與兩國有益，必須更改之處，可以加入，但兩大民族之關係，不能以上列各條，包括罄盡，是以兩國代表，對於商務邊界海關等問題，將來仍須另訂專約。我等竭力設法，以定兩國之和好；並願中國，亦有懇切迅速之答覆。」

蘇俄政府所以有上述接二連三的宣言給中國的原故，完全是因爲一九二二年秋天，俄國國內發生空前巨災之後，西部又被英法諸國封鎖，感受物質缺乏的痛苦，想在中國安放其東方政策的基礎。一九二二年八月越飛以蘇俄政府及遠東共和國兩全權代表的名義到北京，初到的時候，一方面施用外交上的宣傳手段，發布「東方民族聯合」，「建設中俄兩國人民之友誼的關係」等談話，以博得中國人民團體的歡迎；一方面與北京偽政府進行非正式的接洽。並且故意發布「中俄日俄兩交涉將同時進行」。

「日俄交涉開議前必開一中俄會議」等消息，想引起中國人民對俄的好感。但是日俄長春會議在九月間開會，越飛未及將中俄交涉議有頭緒，即忽忽出京，及長春會議破裂後回京，越飛又患重病，不能進行交涉。等到次年一月越飛赴日後，態度忽然大變，與初來時大不相同。一面稱病謝客；一面屢以公文致北京政府，催開中俄會議；而對於中國方面所提的先決條件則置之不答；對於蒙古撤兵，既無切實的答覆；對於中東路問題更否認優林宣言，並故意引起一九二〇年通牒解釋的糾紛。因為越飛奉俄國的使命，東來的惟一目的，在急行取得中日兩國的正式承認，以增高俄國的國際上的地位。至於解決懸案，則非其所願。當時蘇俄代表越飛對於日本的態度，還是和以前對德的態度一樣。對於中國的外交，尤非出於誠意。他一方面與北京政府進行中俄談判；他方面又乘中俄交涉進行的時候，秘密訂定俄蒙條約（見上章），攘奪蒙古的權利。並且自一九二二年秋天，遠東共和國合併於蘇俄政府，海參威又適於此時自白黨轉入蘇俄

政府，於是俄國又改變了越飛初來時的對華政策，越飛又適有病，遂藉以延宕中俄的交涉，及一九二三年一月越飛見事無可爲，始離開北京。

加拉罕於一九二三年七月繼越飛之後，以俄國外交人民委員長奉命東來，代越飛任遠東特別全權代表，進行對日對華交涉，加拉罕在北京仍是襲用越飛在外交上的政策。一方兼用越飛的舊策，操縱於中日兩國之間；他方又利用其「東方通」本身的優點，及因手草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兩次宣言所獲對華的好感，努力作外交上的宣傳。卒因加氏幾度的計劃與活動，與王正廷商定了中俄協定，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簽字。

中俄解決懸案協定全文共十五條，就是：（一）本協定簽字後，兩締約國之平時使領關係，應即恢復；中國政府允許設法將前俄領使館舍移交蘇俄政府。（二）兩締約國政府，允於本協定簽字以後，一個月後，舉行會議，按照後列各條之規定，商定一切懸案之詳細辦法，應從速完竣，但無論如何，

至遲不得過自前次會議開始會議之日起六個月。(3) 兩締約國政府、同意在前條所定會議中、將中國政府與前俄帝國政府所訂立之一切公約、協約、協定、議定書及合同等項、概行廢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則、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兩年蘇聯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訂條約、協定等項。(4) 蘇俄政府根據其政策及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兩年宣言、聲明前俄帝國政府、與第三者所訂立之一切協定條約等項、有妨礙中國主權與利益者、概爲無效。締約兩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定。(5) 蘇俄政府、承認外蒙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聯政府聲明一俟有關撤退蘇聯政府駐外蒙軍隊之問題、即撤兵期限、及彼此疆界安寧辦法、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商定。即將蘇聯政府一切軍隊、由外蒙盡數撤回。(6) 兩締約國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該國境內、不准有爲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與舉動。並允諾彼此不爲與



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對之宣傳。(7) 兩締約國政府、允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將彼此疆界重行劃定。在疆界未行劃定以前、允仍維持現在疆界。(8) 兩締約國、允將兩國邊界江湖及他種流域上之航行問題、按照平等相互之原則、在前條所定之會議規定之。(9) 兩締約國政府、允在前條所定之會議中、根據下開原則、將中東鐵路問題解決；

(一) 兩締約國政府、聲明中東鐵路、純係商業性質；並聲明除該路本身事務、直轄於該路外、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務、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皮)等、概由中國政府辦理。

(二) 蘇聯政府、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一切財產、並允諾將該路一切股票債票移歸中國。(三) 兩締約國政府、允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解決贖路之款額及條件暨移交中東鐵路之手續。

(四) 蘇聯政府担任於中東鐵路、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九日革命以前、所有股東持股票者及債權人、負一切完全責任。(五) 兩締約國政府、承認對

於中東鐵路之前途，祇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六）兩締約國政府，允在本條第三項所規定事項，未經解決以前，特行規定暫行管理中東鐵路辦法。（七）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之會議，未將中東鐵路各項事宜解決以前，兩國政府，根據俄曆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西曆九月八日所訂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所有之權利，與本協定及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暨中國主權不相抵觸者，仍為有效……（十）蘇聯政府允予拋棄前俄政府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根據各種公約協約協定等項，所得之一切租界等特權及特許。（十一）蘇聯政府，允予拋棄俄部分之庚子賠款。（十二）蘇聯政府，允諾取消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十三）兩締約國允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之會議中，訂立商約時，將兩締約國關稅稅則，採取平等相互主義，同時協定。（十四）兩締約國，允在前條所定之會議中，討論賠償損失之要求。（十五）本協定自簽字日起，即生效力。

我們細玩中俄協作的原文，對於該協定根據的大綱，雖似官冕堂皇；其

實在細則上，這種協定確實給了不少的利益與俄國。這協定中最重要問題，第一，就是關於中東鐵路問題，中俄兩方代表所締結的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中規定中東鐵路的議事機關，為中俄各五人組織的理事會，但是這種理事會只有保管鐵路的實利及文書的簽押，此外並無何種重要的裁判權。鐵路中最重要職務為管理財政，而理事只能與俄國三人中國二人組織的監事會共同核准鐵路的預算及決算，理事會及監事會聯席會議時，俄國的人數較多，自然為俄國謀利益的機會要多，同時該協定又說明「中東鐵路設局長一人，由俄人充任，副局長二人，華俄各一。」這樣說來，鐵路總機關也是俄國人占多數，所以中俄協定雖規定中東鐵路為商業鐵路，而該路的管理權，仍是由俄人操縱。

其次，關於外蒙古問題，外蒙古既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以前蘇俄駐在該地的紅軍，應該早日撤退；中俄協定規定兩國正式會議把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安寧辦法定奪後，蘇俄政府方可將外蒙古一切軍隊撤退。蘇俄既

已承認外蒙古是中國的領土，必要堅持先行解決這種問題，就是因為蘇俄不肯把兵撤退，所以在中俄會議中，蘇俄撤退外蒙古駐兵問題，仍歸不能解決。

中俄協定的外表看來，雖是蘇俄對華親善的互惠條件；實際就是蘇俄對華侵略政策的開始，蘇俄欲在中國實行其東方政策；非略施小惠不可，而且蘇俄的給與中國的利益，已是成爲廢物的俄皇時代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自一九一九年俄帝制敗亡之後，此項不平等條約，中國萬無承認之理，而且中東鐵路的警政權、治外法權、租界及關稅特稅，中國早已自動收回，庚子賠款俄國部分，久已未付，可見這些權利，並不一定是蘇俄給與的；實際上蘇俄也沒有供給這些權利的能力。所以中俄協定可以說是蘇俄對華政策實施的開端，也就是他的東方政策在中國發展的起點。

而且當時國民革命的勢力正盛，廣州有孫中山先生所建立的革命政府，蘇俄反不與革命政府正式交涉；公然與全國民衆所唾棄的北京偽政

府勾結，這已經是一「司馬之心，路人皆見」的了。中俄協定中本已承認蒙古是中國的領土，但他後來公然派遣大多數的紅軍軍官，嗾使外蒙古宣告獨立，即說外蒙古實行「民族自決」。（詳情參見前章）他把信誓旦旦的中俄協定，早已作為廢紙。去年國民政府為防止蘇俄繼續在中國作戰起見，宣布「對俄絕交」，而蘇俄政府公然也不客氣的說，中俄兩國於一九二四年在北京簽訂條約，只承認北京政府，「從未承認」——所謂南京政府。蘇俄這種勾結中國軍閥為惡相濟的陰謀，是與帝國主義的行徑，同出於一轍。

由此可知蘇俄政府最初的對華政策，在北方就是勾結北洋軍閥，締結所謂中俄協定，以取得在中國活動外交上形式上的根據。在南方則發展他們的御用工具——中國共產黨——底組織，企圖侵入國民革命的戰線以內。中國共產黨雖始於一九二〇年，但是當時僅是一個小規模研究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學會。直到一九二四年他們開第三次大會的時候，始改稱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僅五六百人。在這一年第三國際便命令中國

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時又適當本黨在正式改組，擴大國民革命勢力的時候。當時共產黨內，又因加入國民黨問題，引起了兩派的紛爭。後來第三國際派遣威丁斯基到中國來，表面上雖是調和兩派的鬥爭，實際上威氏是奉第三國際的命令，陰謀利用他們內部的分裂，謀以他們的左派鎮壓他們的右派；更利用他們之加入國民黨，謀以他們的右派來聯絡國民黨，而以他們的左派來分拆國民黨，這種右聯左拆的策略，就是蘇俄政府拿向來對付俄國各黨的慣技，來實行他們分散我國國民革命勢力的陰謀。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蘇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任務的議決案，就是：

「我們應以國民運動為中心工作，並同時發展我們黨的組織及國民運動中『擁護無產階級利益的宣傳』及『分拆國民黨之勢力』。」

後來中國共產黨幹部在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之後，發見該黨黨員有左傾或右傾的錯誤，特開擴大執行委員會，重行確定對於國民黨戰術的原則，對

於本黨已開始施行急進的破壞。他們當時的計劃就是（1）要在沙面罷工和江浙戰爭中，分化國民黨的左右派，使之發生劇烈的衝突。（2）要把國民黨中的工人農民及知識階級的急進分子結成左派；宣傳國民黨中的軍人官僚政客資本家爲右派；而指摘其在廣東和大商買辦階級及地主合作的錯誤傾向；我們要聯合國民黨中派，他們是些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的革命分子……他們在數量上雖不甚重要，却站在國民黨領袖的地位。（3）我們幫助國民黨組織上的滲入產業無產階級，是非常危險的，要努力從發展國民黨之組織中鞏固，我們無產階級的基本組織。這三大原則，就是三年來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總策略，我們只要回顧到過去共產黨搗亂本黨的痛史，就知道這三個原則就是共產黨用來破壞本黨的最毒恨的陰謀。

等到總理北上逝世以後，蘇俄共產黨認定是在中國發展的新時期，便指示中國共產黨努力從事新的發展的工作。所以中國共產黨就在這時開

了一個全體大會，他們的決議。就是：

「我們在國民黨中的工作，已經入了一個新時期，而工作的方針，亦應有左列幾項新的決定：

(1) 國民黨的分子包含有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及工人農民階級，在羣衆中，他們有造成階級調和和觀念之危險，因此，我們在國民黨中工作，對於各種運動，須努力保存階級鬥爭的成分。

(2) 我們固然承認國民黨是中國民族運動中一個重要工具，然亦僅僅是一個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國民族運動之全部；因此，我們在國民黨內各級黨部，並且要在國民黨外各社會團體，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政治，反對帝國主義工具之買辦階級，擁護工人農民一切勞苦羣衆的利益，指摘國民黨中及民族運動中的右派，和帝國主義妥協和反動的軍閥妥協，和買辦地主階級妥協及壓迫農工一切勞動平民的每個反革命的事實，並暴露國民黨中派游移的態度。



(3) 我們應當在思想上組織上，尤其是在民衆宣傳上，擴大國民黨的左派；對於國民黨中派領袖，及一切左右派間游移分子，應該在具體事實上，糾正其右傾政策之錯誤。使之離開右派，從事不妥協的革命時，我們應協同農民羣衆贊助他們，但同時必須在農工羣衆中解釋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之不同。

(4) 完全在我們同志指導之下的國民黨各級黨部應該努力宣傳黨員羣衆，使他們都有明確的左傾觀念，才算是整個的左派結合。單靠感情的聯絡，或只是黨部領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夠的。」

共產黨利用本黨革命領袖的逝世，而加緊了他們分化本黨的陰謀。他們分化的工作，是一直從下級黨員羣衆中做起的。因之而黨內的裂痕，也都從各級黨部的衝突上表暴出來，同時在楊劉既平以後，第三國際就訓令中國共產黨員，實行竊奪國民黨的政權，他們的計劃第一步就是大元帥府告一結束，改爲委員制。其次，就將國民黨黨員之有力者逐一推倒。結果

中國共產黨就照原定的計劃實行，首先改組大元帥府，接着就徹頭徹尾底實行分拆國民黨的預定計劃，以其所謂左派首領的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作共產黨指揮的工具。於是共產黨一方面抓住國民黨最高機關裏面的幾個主要的部分；一方面煽動國民黨中下各級黨部的「左派」。把國民黨自上而下的忠實黨員，都給他一個「右派」或「反革命派」的帽子排斥出去。

到了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兵艦謀叛的事件發生以後，第三國際已訓令中國共產黨再進一步奪取本黨的武力；而主其事者則為東方監察委員會主席苦必亞克。他冒名商務委員，煽動三月二十的謀叛事件。卒由蔣介石事先防止，并將海軍局長李之龍及其他附逆的黨員數十名逮捕；又將蘇俄在廣東政府服務的人員二三十名送回俄國。而受共產黨所左右的汪精衛氏，也不得不藉故逃向國外去。這次事件直接是對中國共產黨活動的一大打擊；而間接尤影響於第三國際對華的侵略政策。這是

蘇俄對華陰謀的第一次失敗。

本黨於十五年七月一日誓師北伐，實行掃除國內封建的軍閥，這完全是基於民衆的熱望，弔民伐罪，求促進國民革命的成功，但爲蘇俄的工具——中國共產黨——所嫉視。進行其破壞北伐的陰謀。他們在宣傳上，就說國民黨的北伐並不是推翻軍閥解放人民唯一無二的希望。污蔑北伐爲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慾的活動。並且造了許多謠言，說北伐是搜括平民，剝奪人民的自由。總之他們認定國民政府不應該北伐。他們的用意不外是在本黨的革命勢力不能發展，而北伐的大業受其破壞而中止。所以鮑羅庭命令中國共產黨在北伐軍將出發之前，實行暴動，以推翻國民政府。鮑羅庭當時的計劃，就是奪取兵工廠，企圖置於共產黨管理之下，同時又煽動工潮，召集土匪編爲工農軍，實行暴動，推翻政府，但是這種計劃終沒有成功，而他們破壞北伐的陰謀，反因而暴露，這是蘇俄對華陰謀第二次的失敗。

自此以後，蘇俄對華的侵略，已日趨積極，由潛伏的陰謀，進而為顯然的竊奪。在國民革命軍勢如破竹的進取到了長江以後，蘇俄駐華的侵略者鮑羅庭，遂御用汪精衛一般所謂左派者，公然竊奪黨權，建立所謂武漢政府，把持本黨高級幹部，實行以「國民黨制國民黨」的策略，使一切不受蘇俄役使的國民黨黨員，或慘遭屠殺，或被排斥，更實施紅色恐怖，使兩湖人民橫受魚肉。本來第三國際對於這次建立武漢政府的計劃，早經一九二六年十月莫斯科第七次擴大幹部大會通盤籌畫過，次年（即一九二七年）三月即由印度共產黨人羅氏帶到共產黨的秘密決議案到中國來。這種議決案的內容就是：（一）關於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二）在中央委員中增加新的領袖，代替老中央委員。（三）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四）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兩湖挑選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五）以知名的國民黨員作領袖（不是共產黨）組織革命法庭，處罰反

動的軍官。這是共產黨在武漢方面對於所挾持的政府和黨部所取的策略。同時又想在上海及各地實行武裝暴動；在去年秋間俄使館文件第二十二項中有去年三月間上海中國共產黨與俄顧問所開聯席會議之議事錄，其中記載頗為重要。『赤色恐怖』一名詞，竟見於該議事錄上。今試抄錄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如下：

『赤色恐怖現已大見効力，反對罷工者及平時壓迫工人者，已有十餘人被殺，其餘均已大受恐嚇，多自行逃逸或改變行爲。平時作工頭或其他爲工廠方面出力之人。此時多用種種方法來求工人饒恕，並自聲明不反抗，現在赤色恐怖可略略緩和，此後應作較大規模之籠絡。此種恐嚇手段，於共產黨並無重大之損失。』

此外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關於武裝暴動條件的訓令，就是（一）武裝暴動的口號，必須要在中國國民黨作民族解放運動的機會之下提出，使一般做共產黨實際工作的人了解其意義和準備武裝暴動的技術。

(2) 中國已沒有集權的政府，在此種情形之下，武裝暴動客觀條件之形成，已經成立，此時準備武裝暴動是最好的時機。(3) 中國現時有代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政府，即國民政府，共產主義仍須堅守「聯合戰線」的策略，務須取灰色的態度，侵入國民政府權力之下，作成培養武裝暴動之客觀形勢。(4) 中國人民除反對軍閥官僚之外，還反對帝國主義，要在此種客觀情況之下，引動農民革命，編成鞏固的農民軍，以之為基礎，斷行勞農專政前的武裝暴動。

這種武裝暴動的計劃，最初是在上海，去年上海四月間總工會的暴動，就有俄國人從中指揮。去年春間蘇俄對華的侵略政策，就不外兩種：第一根本剷除國民黨的武裝勢力，收買叛黨分子，求無形中消滅國民黨奪取政權。第二隨時造成種種武裝暴動，引起社會的大混亂，實行紅色恐怖，企圖建立他們所夢想的無產階級專政。

但是自本黨實行清黨以後，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奠定首都

中國共產黨在國內除兩湖外，已全失其活動的根據地，不久武漢也因競爭權利，大家發生分裂，於是共產黨更喪失其政治上的根據地，而鮑羅庭便不得不逃回莫斯科，武漢共產黨也就不得不抱頭鼠竄，蘇俄在華的一切政治上的勢力，根本消滅，這是他們對華陰謀第三次的失敗。

## 第八章 蘇俄最近對華陰謀之暴露

我們要解剖蘇俄最近對華的陰謀，應該從第三國際第七次擴大幹部會議說起。一九二六年秋季第三國際召集擴大幹部會議，是專以中國問題爲會議的中心。在第三國際每開大會之前，照例先開全聯邦蘇維埃共產黨大會。在這次大會中決定了大體方針之後，再交第三國際幹部會議討論。第三國際第七次擴大幹部會議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開會。會前（十月二十六日）曾開全聯邦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當時首先由布哈林作主要的關於國際政策三小時的長篇演說，而以中國爲其政策的骨幹，布氏最後的結論，就是世界革命將由下述三種歷程而演進，第一就是中國數億民衆革命之進展，在他們認爲是世界革命最樂觀的事。其餘就是英國煤礦工人的團結與俄國以內資本主義的經濟之撲滅。當時狠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而中國問題便成爲第三國際大會捲起風雲的大問



題了。

本來蘇俄共產黨內部，有幹部派與反對派的對立，這兩派在政策上都是立於絕對相反的地位。別的姑且不說，就中國問題來論，他們兩派都各有其不同的主張，我現在試先分拆他們的意見，以見他們對華陰謀的背景。

中國革命的意義在我們看起來，完全是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既不帶所謂「資產階級性」；也並不是一「階級的」，這種革命的意義，是非常偉大廣博的。而俄國共產黨竟然抹殺事實，對於我民衆的革命，加以污蔑，這已令人髮指了。杜洛斯基是反對派的首領，他攻擊幹部派的斯達林的對華政策為騎牆主義的妥協政策。他認定：

(1) 中國封建制度的殘留物雖然存在，但已近於沒落，力量微弱，不配做「農業革命」的對象。

(2) 中國革命是根本上以民族的資產階級革命為主。在此革命潮流之下，軍閥官僚資產階級革命為主，在此革命潮流之下，軍閥官僚

資產階級等等，都混合起來與帝國主義作對，如張作霖亦主張關稅自主，就是證明，而且同時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發展到要求關稅自主的地步，這足見中國各種勢力都上了資本主義的大道，所以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此時即可直接拿資產階級作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而不應採用與資產階級妥協的什麼聯合戰線的策略。

(3) 以此標準而論，現在第三國際的策略，是拿中國共產主義者與資本主義的聯合戰線，這便是「騎牆主義者」的妥協政策。

總括的說：杜洛斯基妄指我國的國民革命為「民族的資產階級革命」他這種誤解，是由於他太固執了馬克思主義的成見，而忘記了中國國民革命的真實背景，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是「無的放矢」。

至於幹部派的斯達林，是列寧的嫡系，所以他處處都是死抱着列寧的成法，對於中國革命的見解，仍不外保持列寧的傳統觀念，他對反對派關於中國問題的攻擊，更竭力與以答辯。他以為杜洛斯基的根本錯誤，「在於不

理解中國革命意義與其性質。」他認定：

「第三國際的政策，是從現在刺激中國「農民革命」——其反壓的要素是封建的殘餘物！這一點出發的。第三國際之政策，是從中國農村封建制之殘餘物及殘餘物上擁着一切的督軍、官僚、如張作霖一派的上層建築、整個的軍閥官僚制——為現在「農業革命」發生而更發展之根柢，這一點而出發的。因為擁着上層建築全部軍閥官僚的封建殘餘物，是在中國壓迫之基礎的形態。所以中國現在，無論從力之點說，或從範圍之點說，都是漸漸進行最大的「農業革命」。但是「農業革命」是什麼呢？它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與其內容。因此第三國際說：中國現在正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

同志杜洛斯基對於中國問題的曲解，其出發點是什麼呢？它是和剛纔所說第三國際的見解垂直的對立的。杜洛斯基同志全不承認在

中國的封建之殘餘物存在麼？雖然承認而並不予以何等決斷的意義。將在中國封建以官僚軍閥的重壓之力與其意義估量過小的杜洛斯基（反對派都是），是以中國國民革命主要原因爲對於帝國主義諸國之中國民族的關稅政策之依存。我請諸君許我引述杜洛斯基同志數日前提出於俄共產黨與第三國際的中央委員會他的有名的方案。他這方案的標題是寫着『中國革命與斯達林的方案』的。杜洛斯基同志有下面的話。『心中竊作無理由的想像的，是因爲說『封建殘餘物』在中國經濟上有表面支配的權力，而便要承認騎牆主義的妥協的見解之布哈林同志！縱使布哈林同志對於中國經濟問題之判斷，是根於經濟的分析，而非根於就『封建殘餘物』一個概念之煩瑣哲學的定義，不拘如何，我們也不能承認他那樣顯明地幫助四月之翻覆的政策吧！中國革命，是根本上以民族的『資產階級革命』爲主。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之發展，是突破中國對於帝國主

義諸國之國家的關稅依存性之限界的。

只看這所引述的，就可見杜洛斯基同志不是對於第三國際解釋中國革命的性質之見解而爭論，而是對於布哈林同志的妥協政策而爭論。這不消說是錯的。實際上這方案成爲問題的，是杜洛斯基否認在中國封建制殘餘物之『支配的權力』。實際上成爲問題的，是他把在中國燃燒起來的『農業革命』詭變爲上層的革命，所謂反關稅的革命。杜洛斯基同志因爲要隱蔽他從第三國際的見解而變離，所以就有漫罵布哈林同志的『妥協政策』之必要。我率直的說，這就是杜洛斯基慣做的扒手的奸計。

所以依杜洛斯基的見解，則中國國民革命之主要原因，不是持有上層建築官僚軍閥的封建制之殘餘物，而是向於帝國主義者之中國關稅的依存性，以此結果，中國的革命，爲主的就是反關稅的革命。

以上爲杜洛斯基同志的出發點。這是他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的見

解。

諸君，我請大家注意，這個見解是『大元帥』張作霖的樞密院的見地。如果杜洛斯基的見地是對的，我們就不能不認張作霖和蔣介石的見地也是對的。什麼緣故？因為他們也不願『農業革命』不願『工人革命』，僅僅努力於廢止不平等條約，確立中國的關稅自主權的緣故。杜洛斯基，只是落到蔣介石與張作霖的秘書的見地罷了。

如果布哈林同志乃至第三國際所說封建制之殘餘物於現在的階段有支配權力的意義是錯的，如果中國革命的基礎是關稅的依存性，不是對於封建制殘餘物及擁護它的帝國主義之鬥爭，那末，持『沒收地主土地』與『土地國有』之要求的『農業革命』從何處來的呢？舍此而外，還有什麼理由可以在這時候說中國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呢？沒有什麼事就可以說『農業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嗎？『農業革命』可以是從天降下來的嗎？在

湖南湖北河南諸省——那是農民以他們自身的權力、作成他們自身的裁判所；與他們自衛的組織、驅逐地主、對於地主而作『平民的』舉動、——巨大的『農業革命』、裹着幾百萬幾千萬的農民、這是並沒有何等事實而瞎說的嗎？如果封建軍閥不是中國壓迫之支配力、這樣強大的『農民運動從何處發生呢？如果我們不說帝國主義是加重壓迫於中國民衆的封建軍閥之最強力的同盟者、如果不立在這個見地上、那麼、如何能使這幾千萬的農民的強力的運動、同時帶反帝國主義的彩色、而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作成『聯合戰線』呢？僅是湖南一省、而現在農民協會、已有二百五十萬以上的會員、這不是事實嗎？那湖北湖南的農民協會已有這許多會員、最近的將來、別的分省、又不要有視此更多的會員嗎？又如『紅槍會』、『空腹同盟』等、難道也是幻想、而並非實在的東西嗎？提出『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之幾千萬農民的『農業革命』、不使其劍鋒向於封建制現

實無疑的殘餘物，還要認做頭腦中虛構的東西，附以引用的符號，這是真面目的主張嗎？這時候的杜洛斯基同志，還不是明白變做「大元帥」張作霖的書記長了嗎？同志杜洛斯基的根本錯誤，在於估量過小了中國的「農業革命」，並沒有理解這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性質，否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包含幾百萬中國農民運動之前提，估量過小了在中國革命中農業階級的勢力。

由上述可知斯達林認定中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並且要從這中間另造「農民的農業革命」的勢力出來，更製造所謂共產黨與國民黨聯合戰線的口號，這簡直是斯達林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的最重要的供狀。我們對於他們兩派關於中國問題的主張，都認為是破壞我國民族革命的罪人。他們無論那一派，都是決心要破壞我國，犧牲我國的，所以他們的罪惡，是毫無軒輊的。斯達林想拿中國作列寧主義的實驗場，杜洛斯基又主張以馬克思的空想來為禍我國，我們對於他們的主張一律



在極端反對之列。

現在蘇俄政府是斯達林獨攬全權，所以最近一兩年以來蘇俄對華的陰謀，都是以斯達林的主張爲出發點的。這種陰謀最積極的表現，就是第三國際第七次擴大幹部大會。該會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於莫斯科之克倫林本宮之安德利殿廳。主席布哈林報告開會辭後，便有中國共產黨代表譚平山以中國共產黨名義，對於列寧所手創的「世界革命參謀本部之第三國際」表示祝賀之意。並概敘遠東國際帝國主義者的競爭與其間勃興之東方民族革命發展的情形，他最後歸根的說：「對於殖民地國家之民族解放運動唯一正當之見解，惟有列寧主義……」譚氏這種論調，頗似李完用的口吻，但是爲了要得蘇俄政府的歡心，尤不得不歌功頌德，中國共產黨的背景，委實可憐！

大會開幕的第一日，即發布一篇「敬告立於戰線之中國民衆」這宣言的大意，不外是鼓勵中國革命之發展，作他們世界革命策略的反宣傳。略

謂：『民國革命已屆十五週年……此十五年中，中國革命外因帝國主義之壓迫，內受軍閥之專橫，遭受無窮之阻礙，卒能誘導農工民衆入於民族解放之鬥爭而得獲很大的成功。如一九二五年之上海總罷工及經十六閱月之香港罷工，已明示中國工人於民族解放之戰鬥上，行將立於指導的地位……現在粵軍之勝利，已使國民政府的領域擴大，已占了中國版圖之半，是中國革命之成功，可引起東方各殖民的獨立……』

自二十三日起已入於議事日程。布哈林氏以幹部代表的資格，作三小時的長時間的報告。他的報告題目，雖爲『國際政局與第三國際之使命』，但布氏特別着重於中國問題。他說：

『我們目前在中國的事業，首在打破帝國主義。然中國革命關於此點，已大獲勝利，即粵軍進抵長江，馮玉祥軍又將睥睨北京，但這是中國目前的形勢，究竟將來應採取何種策略，這是第三國際對於中國最大的使命。目前要形成中國與蘇維埃聯邦及西歐無產階級同盟，而使

中國非資本主義的發達至於可能，固屬很難，但是我們務求努力完成

……

布氏便又進一步報告所謂「資本主義之安定與無產階級革命」。他又斷定：

「中國前途有兩個方向全異的途徑，一方面是與外國資產階級妥協，屈服在他們武力乃至經濟的支配之下；他方面便是與無產階級獨裁（即蘇維埃聯邦）及西歐無產階級同盟，使他們牽制列強的對華侵略……所以第三國際務須努力誘導革命的中國，向着第二條路上去……」

我們看了布哈林的自供狀，可知蘇俄對華的策略，全在消滅中國民族革命的獨立的勢力，作成蘇俄統治下的聯邦之一。所謂聯合，就不外是這種用意。中國革命的正當途徑，決不是如布哈林所謂「只有兩條方向全異的途徑」，中國的革命既決不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也不願為無產

階級專政的附庸，而願以全國民衆獨立的堅強的毅力，爲本國民族爭獨立爭自由而奮鬥，布氏的陰謀，只是『弄巧反拙』而已。

至關於此次擴大幹部會議對華的議決文，在前年搜查北京俄國大使館的時候，即已發見。此項議決案全文共八大項，是蘇俄共產黨對華政策之重要文書。今試逐條評述如左：

第一、帝國主義與中國革命——帝國主義因國民革命之進兵北方，已自其勢力範圍失出中國領土之大半。北伐軍是否繼續前進，雖不可知；但其結果當然是打倒帝國主義，確立中國之獨立；而增加其對於帝國主義反抗的勢力。帝國主義者自孫傳芳軍失敗以後，感於利用軍閥傳統政策的無效，於是想採取適合於新時代的其他政策，這便是列強有承認南方政府的傾向。其中美國首先主倡，日英兩國也逐漸有採取承認南方政府方針的傾向。但這是外交上一種策略，其裏面實有壓抑革命的陰謀。列強對華武力的干涉，現在仍然存在。中

國革命的勝利，在世界的資本主義方面，實是一種重大的打擊。所以列強帝國主義者，盡其所有的方法，以壓迫中國的革命。中國革命雖僅實行其本國境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但可以稱為世界革命之一部。今試就此點來說，中國革命實有下列種種利益。

- (1) 帝國主義之列強互相反目；
- (2) 世界資本主義已頻於危機。
- (3) 西歐諸國之勞工運動愈益發展，對於各國之對華武力干涉，目前正在進行其反對的氣勢。
- (4) 各國殖民地的民族運動與中國革命的成功，更得同時發展。
- (5) 在無產階級獨裁下的蘇維埃聯邦，現在控制於中國的北邊。

中國革命與前世紀的西歐諸國及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相異。因為中國現在正處於半殖民地的狀態，並且是在外國帝國主義的控治之下，正是向世界革命時代進行的。反動軍閥依然是帝國主義援助之下，防止革命的勢力，已不足恃。所以列強現在正想引誘中國的資產階級，使他們不與革命黨合作。但近來不但資產階

級甚至從前與革命軍相戰的軍閥，也漸加入國民革命運動，而與南方政府妥協，這是他們想從工人手中奪取其革命指導權之一種政略。」

從這第一項議決案中，我們很明顯的看出蘇俄想使中國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之一部，這種陰謀是值得注意的。中國的國民革命決不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完全在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並不是以世界革命為手段的。蘇俄政府現在想消滅中國革命的國民性，而使他造成世界革命之一部分，這完全是離開了中國國民本身的利益，拿中國做他們的試驗場，這是我們不能坐視的。

所以我們認定中國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完全是站在民族利益的本身上面，是整個的民族，要求自由，要求解放的富於國民性的民族革命運動，既不願與任何帝國主義的列強謀妥協，尤不受蘇俄政府的任何支配。明白了中國革命的真實，對於他們上面第一項的議決案中所論及的，可知完全是厚誣了中國的革命，這顯然是蘇俄共產主義者的一心肝別具「這種

陰謀，尤其是我們應該明白攻擊的。我們再看他的第二項決議，又是如何。

第二、中國革命之前途 中國革命現狀，雖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將來必為擴大的共產主義運動，驅中國的革命以至於終局；不宜造成誘導資本主義之發達的社會政治狀態，中國革命始於資本主義的衰落期。中國革命應打倒資本主義，務成為建設社會主義之整個的戰鬥之一部，可由革命而建設的新國家，尤宜形成工人農民及其他被榨取階級之民主的獨裁專制，並當此資本主義發達的過渡時期，務宜創立反帝國主義的政府。中國革命的成敗，全在無產階級的奮鬥如何。最近幾年間的事變，已證實革命的戰鬥力，僅有無產階級可以組成。軍閥不過是一種反動的勢力，而為帝國主義者的爪牙。中國多數的有產階級與外國資本家結有密切的關係。他們雖一時可為革命之友，但隨時都有加入反動勢力的可能。中產階級的獨立者雖無能為，但若誘導得宜，可為革命之友。現在進行中之中國革命勢力，須為工

人農民及中產階級的革命團結，但此團結之支配的地位，須入於工人之掌握中。

由這項決議案看來，蘇俄對華的陰謀，可謂完全暴露。他們想使中國的國民革命，轉變而成爲共產主義的革命，使中國民族淪入莫斯科政府統治之下。所謂「中國革命現狀，雖爲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將來必爲擴大的共產主義運動，驅中國的革命以至於終局」這種供狀，顯然的是蘇俄對華政策的中心；而其目的就在於「形成工人農民及其他被榨取階級之民主的獨裁專制」；換言之，就是由第三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利用時機自立所謂蘇維埃政府，以隸屬於蘇俄政府統治，這是蘇俄陰謀的背面，我們應當十分注意的。

第三國民革命與農民 農村問題在中國現勢上，正爲革命之中心，握此問題關鍵的階級，即可爲革命之首領人物。今中國能行急進的農村革命的只有工人。中國共產黨爲要求徹底實行農村革命起見，宜



主張土地國有。但目前審察各地特殊政治及經濟情勢，務宜斟酌施行革命，而在南方政府之領域內，應講求下列各項具體的改革方法。

就是（一）極端低減地租（租地費）（二）廢除各種租稅，代以同一稅率之農業稅（三）凡對於反抗革命之軍閥，並對國民政府有戰鬥行為之商人及地主，應沒收其所有地，凡廟產亦必沒收（四）使南方政府極力講求保護農民之方法（五）解除地主所屬民兵之武裝（六）武裝農村貧民及中農，俾屬於該地長官支配之下。但此係過渡時期之改革，將來務期實行更深刻的徹底的農村革命。

說到共產黨拉攏農民的政策，本是他們最慘毒政策的一種。蘇俄共產黨受列寧傳統的政策，利用農民，作為無產階級的犧牲品，在俄國過去已經有狼顯著的事實。他們一方面說農民富於小資產階級性，沒有革命的可能；同時又須利用農民，使農村分化，助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中國共產黨更襲用列寧的政策，實行欺騙鄉農，破壞農村，使農民無以為生。他們

利用流氓地痞、任意屠殺農民。製造農村中的經濟恐慌，增加失業無產階級的数量，預備做他們搗亂的工具，更造出「共產即將實現，不須耕作有飯吃」的謠言，誘惑農民，使之自動的放棄其職守。他們所謂「土地國有」……等好聽的話，都是拿來欺騙農民，恐駭資產階級，使他們拋棄其財產的所有權，共產黨便可以大增其收入。去年兩湖江蘇廣州的暴動，陷成恐怖的局面，就是蘇俄共產黨這項議決案的實施。

第四共產黨與國民黨 國民政府下各機關已為共產黨開拓接近農民之途徑。共產黨須利用此種機關，乘時加入新政府，以圖沒收土地，減低地租，組織農會等。今試由此點觀察，則所謂「共產黨應脫離國民黨」的意見，實屬謬誤。共產黨黨員宜留於國民黨內，並宜插入南方政府，以扶助國民黨及南方政府內的左派，俾與右派相戰。南方政府努力之北向擴大，益使共產黨有參加國民政府之必要。共產黨為欲將國民黨造成真正之國民政黨，換言之：造成與帝國主義及其爪

牙對抗之無產階級與農民及都會之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團體。須採下列的方略。(1) 攻擊國民黨右派、推翻戴季陶一派之使國民黨化爲有產階級政黨之思想。(2) 鞏固與左派的聯合戰線。(3) 對於彼徬徨於革命進路又欲與帝國主義妥協的中立派、予以鞭撻追究。

這項可以說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基本策略、一年以前他們勾結汪精衛派、篡奪本黨幹部及國民黨、造成武漢的割據局勢、全是照着這種計劃來實行的。獨惜汪精衛派始終執迷不悟、以左派自居、甘受蘇俄的利用、使黨權一落千丈、共產黨之計固狠險毒、而汪精衛派之引狼入室、其心實不堪問。末了、共產黨在第八項中、還有一個險狠的決議、就是利用國民革命的武力、作爲他們搗亂的基本勢力。他們議決案中說：

國民革命運動之成敗、主要的繫於將士的革命心。所以共產黨不僅對於基本軍隊、應加倍努力；就是在新歸附的軍隊裏面、也應該實行

政治運動。尤其對於軍隊中的將士，有增加工人的信用、勸與革命機關連絡的必要；同時應使工人援助軍隊、團工人與軍隊的接近，並宜使國民政府供給武器與農民，以期增進革命中農民的勢力。

我們看了共產黨上面所述的計劃，可知中國共產黨兩年來一切破壞的企圖，都是以這次的議決案為其基本的原則。過去一年間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已無所不用其極。今為暴露蘇俄侵略中國之奸計起見，特將一年來共產黨一切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加以揭破，以為上述議決案事實的證明。

第三國際在國民革命軍勢力已達到長江流域時，便進行實現他們使中國共產化的理想；而以鮑羅庭主持一切擾亂中國的全責。莫斯科僅僅隨時依據幹部大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指令一種大體的方針。他們首先在實現第三國際第七次擴大幹部會議的議決案中第一項，就是誘惑中外軍隊衝突，使我國外交上陷於無可救藥的地位。這可以在一九二

七年四月在北京俄使館所抄獲的文件中看出。此項文件乃莫斯科政府根據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關於中國問題之議決案致駐華武隨員之訓令。其原文如左：

茲特附送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通過之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並將根據該項議決案所擬之訓令寄發，仰即遵照辦理可也。

(一) 現時應全力注意增長中國革命運動之國民性質。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以國民黨爲中國國民獨立黨，而爲有利於國民黨之宣傳。應擴大利用漢口各種事件及英國對於各該事件之態度，資爲證據。第一可以證明國民黨國民工作之進步。第二可以證明歐洲各國對於中國戰鬥力之顯然的薄弱。

(二) 必須於張作霖所佔領之地域內，造成排歐之紛亂。

(三) 破壞張作霖之威信，宣傳張氏爲國際間各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妨害中國國民黨自由工作之受雇者。

(四) 激動反抗歐洲暴行之風潮及英國計劃(以下被焚)

(五) 必須設定一切方法，激動國民羣衆，排斥外國人。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設法獲得各國對於國民羣衆之適用武力戰鬥，爲引起各國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遇有與歐洲軍隊衝突事件發生時，更應利用此種機會，實行暴動。

(六) 現時應暫緩實行共產黨綱，因此時實行，可使張作霖之地位鞏固，並加重國民黨之分裂。吾人已向鮑羅廷嚴重訓令，暫時停止對於資本階級之過激手段。張作霖失敗之前，應抱定自己之宗旨，即在國民黨內，暫行保留國民之各種階級，資本階級亦應保留。

(七) 實行此種排斥歐人之運動時，保存各國間之一致協調，非常重要。日本能於最短期間派多數軍隊來華，故令日本與各國隔離，尤爲特別重要。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於一切運動之中，必須嚴加監視。務使日本僑民，無被害之人。但於激動排外風潮之時，將日本除外，殊

足引起不愉快之觀感。故實行激動排外風潮時，必須假託反對不列顛（英國）運動之名義。

此外在去年（一九二七年）三月間，上海中國共產黨與俄顧問所開聯席會議之議事錄中，有：

『吾等應繼續工作，在外國軍隊中宣傳，最短期間，將散布由俄同志等交來之傳單。吾等並積極希望畢庶澄（當時駐在上海之軍官）軍隊與外國軍隊衝突。此種時機，已到成熟；因兩天以前，有直魯軍兵士十餘名經過外國租界，被英兵扣留。彼時一般兵士，聞此消息，皆持槍欲赴租界營救，雖經官長哀懇兵士，勿擊外人，勉強罷爭，而魯兵對於英兵感情，仍非常惡劣。』

蘇俄破壞中國在國際上地位之陰謀，由上述種種已可概見。我國民族的獨立運動，乃是為求我民族平等自由的光明運動，蘇俄必欲乘機搗亂，使我民族運動的偉大意義，因搗亂而毀壞，這種陷我民族於萬劫不復的陰謀，

是最令人痛心嫉首的。最近蘇俄因其詭計不能實現，乃又勾結日本，進行日俄密約，欲想與日帝國主義者，共同聯合總攬控治中國北方，此種倒行逆施的企圖，更益暴露其侵略我國政策之險毒。

其次，蘇俄欲實現他們第二項議決案，所謂『中國革命現狀，雖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將來必為擴大的共產主義運動，驅中國革命以至於終局。』及『形成工人農民及其他被榨取階級之民主的獨裁專制。』於是對於赤化我國的陰謀，遂日益積極。蘇俄於一九二七年春間，派遣多數具有手腕的人員，馳赴武漢，從事篡竊政權的陰謀。其中主要的人物，除鮑羅廷外，還有第三國際代表路易氏與赤色勞工國際代表羅卓夫斯基氏兩人。路易氏是印度共產黨首領兼為第三國際幹部之一。所以第三國際特派印度共產黨首領路易氏來華，其中用意很大。羅卓夫斯基乃世界工會運動的健將。他來華表面上的使命，是為參加太平洋工會大會，同時却負有指導中國工會運動的重要任務。當他們到武漢時，適上海清黨運動爆發，



陳獨秀及其他中國共產黨首領，已紛紛逃奔武漢；同時原定在廣東開會的太平洋工會大會，因廣州清黨的影響，也改在武漢開會。當時自四月末到五月初，中俄兩國的共產黨及工會運動的首領，都集在一處。所以一時共產系的各種會議，續開不已。其為搗亂我國最有力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太平洋工會大會以及中國全國工會第四次大會。在當時蘇俄與中國共產黨各首領，以為他們一方面雖失去北京廣州上海三大根據地；但他方面長江中部的勞工運動，反益呈活氣。於是計劃乘機大整勞工民衆的聲容，以謀篡奪政權的預備。所以這三大會議，對於共產黨作戰的策略上，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所決議的，就是：（一）與國民黨的左派（指汪精衛等而言）提攜，今後仍行繼續。（二）對於勞動者及農會之組織訓練與武裝，當更加努力。（三）與俄國提攜當然繼續。這三大方針既經決定，於是所謂左派領袖的汪精衛便與共產黨領袖組織混合的政府。

而國民黨的最高黨權，也為中國共產黨所竊奪了。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之後，接着便是太平洋勞動大會的開會。其中決議最主要的，就是反對列國對華的干涉與團結工會運動的兩點，即徹底的完全容納共產黨的主張的革命世界化與對英攻擊的兩大方針。全國工會第四次大會的決議，更為猛烈。其中最足以令人注意的，就是：（一）赤色勞工國際因係謀無產階級的利益，向真正革命前進的團體。所以我們此刻正在打倒帝國主義途上，應以各國無產階級為革命友軍，一致聯合起事。（二）對於當時本黨中央及政府的清黨，其決議的要義，就是「以赤色恐怖政策對抗」。

我們由這三大會議議決案看來，蘇俄代表中國共產黨領袖是想以武漢為共產黨失去京滬粵三大根據地後的最後地盤，以圖再舉。所以三大會議，都是一時氣勢很高。但因此使革命軍人對於赤色的威脅，而增反感。當太平洋勞工大會開會期間，突有共產派與軍人關係惡化的重大事件發生，這就是所謂長沙事件。五月二十一日長沙農民協會及工人糾察隊與

第三十五軍之步兵團之間，發生衝突，結果死傷二十四人，而農民協會與工會，一時完全解散。此次事件共產黨要求當時武漢政府處罰長沙軍隊，並應恢復原有各機關，以爲對於汪精衛等左派的試金石。因此向來稱爲互相提攜的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之間，彼此的關係，漸趨於惡化，譚平山蘇兆徵等共產黨出身的政府委員，遂不得不宣告與武漢政府脫離關係。同時四週情勢，也極其緊張。於是第三國際五月所決定的唯一對華政策，在這危勢震撼的兩月中，又不得不重開會議以討論中國問題。

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二七年七月間又開擴大會議，專討論中國問題。其決議的內容，首先指出三點：（一）中國政局及社會狀態之變化，已到了急劇時期。（二）軍人悉趨於反革命派，反動軍閥之勢力，團結益堅。因之革命益陷於危急。（三）中國共產黨之幹部，屢次失策。同時第三國際幹部列舉八大要項。今爲揭穿共產黨之陰謀起見，特分述如下：

一、對於循環變遷之中國革命，宜十分注視革命之推移，與四圍之形勢，用冷靜之判斷，以決定隨機之作戰。

二、自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實行苦迭達以來，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投降敵方，革命已部分的敗北。

三、對於資產階級之背叛與軍人之倒戈，須行澈底的農村革命及改編軍隊的組織，以資應付。

四、目前危局所以釀成的主因，由於隨農工運動之發展，而激成階級利害之衝突。至軍事長官，公然敵視農民，馮玉祥因於徐州會議，與蔣氏相結合，亦至要求武漢政府投降。今武漢之唐生智又將蹈蔣介石之覆轍，而傾向於反革命方面。夫中國革命之狀態如斯，中國共產黨，際茲變局，將何以處之。

五、第三國際遵守列寧之主義，勸中國共產黨，於資產階級正在外與帝國主義，內與軍閥繼續戰爭之範圍內，宜與互相提攜，然武漢已成革

命之敵，與資產階級之提攜政策，已無適用於中國之餘地。

這上面所述，都是第三國際「信口雌黃」，本黨去年四月的清黨運動，是我國民族革命中所必有的過程，而第三國際竟誣爲「背叛革命」，實際共產黨在本黨後方搗亂，才真是背叛革命的行徑。其第五項認歷來第三國際幹部極力主張的「與國民黨提攜」的方針，已歸失敗，這實是他們的致命傷。以下第六第七兩項，則歸罪於中國國民黨及共產黨幹部，猛烈的攻擊他們未曾奉行第三國際的忠告與命令：

六、今後中國共產黨務須脫離武漢政府。因爲國民黨的各首領，既不容納第三國際的忠告；又不肯援助農村革命，反承認唐生智軍之解除農村武裝。一方面武漢雖口稱討伐南京，但時至今日，武漢與南京之戰，由打破社會階級之現狀觀之，已無何等意味。

七、中國共產黨幹部最近迭遭失敗。依第三國際之指令，中國共產黨應爲農村革命的指導者，對於武漢政府及國民黨幹部（指汪精衛

等）首鼠兩端的怯懦態度，宜加以攻擊；同時更應警戒軍事長官倒戈的可能性，感動勞動階級、監督國民黨，勿使其走入反革命。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政治委員會，都沒有實行此項指令，反阻止農村革命的進展。如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所謂「革命之澈底宜先擴大而後深進」。『宜先取北京而次行農村革命』種種，全是機會主義的標語。當各中國共產黨員奔走於農民工人及都市貧民之間，而盡力於羣衆運動之時，共產黨幹部反傾向抑制羣衆的方針。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委員會甚至允許解除工人的武裝。又當武漢政府的巨頭已全出於反革命行動的時候，譚平山氏尚不肯脫離武漢政府，而縱容乞假，是其懦弱之處，不堪目覩。第三國際屢向中國共產黨之指導者，由秘密指令中，加以猛烈的非難。然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竟拒絕第三國際的指令，事實既經變幻如此，則第三國際幹部，在其革命之義務上，已不能不勸誘中國共產黨黨員須反抗該黨幹部的機

會主義。

八、第三國際因急欲矯正中國共產黨幹部，認為有實行下列事項的必要：

(1) 中國共產黨應行示威的立即脫離武漢政府。

(2) 於脫離國民政府時，應發表政治宣言，聲明脫離的動機，是因為武漢政府對農村革命及勞動運動，採取敵對的行爲，並提出嚴格制裁武漢政府的要求。

(3) 不可脫離國民黨，縱於國民黨幹部之指揮下，實行排斥共產黨運動，也須殘留黨內，以圖與黨員接近，使爲決議抗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行動，而企圖推翻該黨現幹部。

(4) 用一切手段向勞工民衆間激起運動，團結其組織，鞏固職工工會，引導他們決然以積極的行動，爲正面的戰鬥。

(5) 擴張農村革命，依據工農及都市無產階級的革命團結，繼續其

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運動，並因此謀系統的工農的武裝。

(6) 建設黨內秘密機關，以避免壓迫與刑罰。

(7)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應改去其機會主義的過失，講求必要的措置，使該黨幹部抵於政治的健全。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就中國共產黨全體及其幹部本身而言，認為負有政治問題之特別重大性。所以全體黨員應以第三國際之決議為基礎而團結努力，繼續以與本黨幹部之機會主義的傾向相戰。

以上七項為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之在前線者的指令，我們由此可以看出第三國際對華的陰謀，始終是積極進行的。我民族如果不自振作，不獨白色帝國主義之毒焰可畏，就是赤色帝國主義者——第三國際——的假面具的民族政策，也是對於我民族有重大損害的。





## 第九章 民族自決與我國革命之前途

『我們受屈的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的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是不能發達，由此便可知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如果丟棄民族主義，去講世界主義……那就是根本推翻』。

### ——民族主義第四講——

在目前世界風雲劇變，足以危及我民族獨立局勢之下，我們讀了上面孫先生不朽的遺教，我們應該發生什麼感想？受第三國際唆使的中國共產黨，目前在國民革命戰線之內所發生的叛亂，是中國民族解放前途一個大障礙，我們對於此種反動，應如何的去努力應付？這兩種重大的問題，是今日本黨每一個忠實的同志所應明白認識的。

自 總理容許共產分子滲入本黨之後，因為他們曲解本黨主義，破壞本黨信仰的結果，使本黨主義含糊不明，而一般民衆也因之對於本黨主義，不能認識清楚，所謂「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使我民族的自信力，日趨於消失，而國民革命前途，便不能猛烈進展，這是共產黨對於本黨的毒狠策略。

本黨的主義，產生於 總理的學說。關於一切政治經濟的各種問題，總理不獨給我們以解決的方法；並且指示我們以決定方法的理論。三民主義是救國的主義，我們努力的目標既在國民革命，則凡是國民，不問其階級屬性如何，必喚起他們民族的、政治的、經濟的覺悟。結合各階級的革命分子，爲本黨組織的基礎。所以我們團結的對象，是整個的民族，不是某一階級革命與某個階級的分別，而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別。所以國民革命之完成，由先知先覺發軔於前，得後知後覺的宣傳，與不知不覺的實行，集合各階級的勢力，共同完成。這是 總理指示我們的方略，也是本黨同志信從的唯一的理論。

可是三年以來，共產黨人所用以破壞我民族運動的法寶，在以階級鬥爭的宣傳，來分散革命的力量，年來民族運動的勃興，屢扑屢起的，雖然由於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壓迫，但我們革命戰線之未能鞏固，與各階級合作之未能維持永久，這實是年來民族運動失敗的最大原因。一切過去的事實，都可以作為我們的憑證。前年「五卅」慘案的發生，是英帝國主義者對我整個民族所施的侵略。所以當時引起各階級的覺悟，造成全民族一致的行動，可是不久我們的陣線中，就漸肇分裂的現象。結果階級鬥爭減退了民族運動的勢力，而最大的慘案，便無形的失敗下去，我們回首往事，益滋心痛。

綜合年來民衆受共產黨曲解本黨主義的結果，有下列幾種的錯誤：

(一) 誤認階級鬥爭為實行國民革命的良好武器——國民革命戰線中之不容階級鬥爭的存在，已是極顯然的道理。階級鬥爭，只是社會一種病態，決不是社會進化的常規。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的講演中，解釋十分的明白，先生以為：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進化。」

所以 孫先生斷定「馬克司認階級戰爭是進化的原因，是倒果爲因——本源不清楚」。我們由 孫先生上述的遺教中，可知階級戰爭，只是一種病徵，決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而況國民革命是各階級合作的事業，尤不應有階級鬥爭的存在。所以階級鬥爭不僅不是實行國民革命的武器，而且且是破壞國民革命的工具。其破壞的能量，尤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與軍閥的宰割政策，爲更慘毒。

(2) 誤認蘇俄爲我民族唯一的救主——蘇俄放棄以前帝國時代的侵略政策，與我平等結合，這固然是我們應認爲友的原因。所以 孫先生因此才訂下聯俄的政策，這種政策的本身，也不過是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決不是因爲俄國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也不是供第三國際的驅策，乃是在以

平等待我之意義上相結合。申言之，凡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都有聯合的可能，決不是單指蘇俄一國。所以 孫先生說：

「俄國人民發生一種新覺悟。……現在要解除痛苦，故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俄國的主張和威爾遜的主張是不約而同的，都是主張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能夠自決，都能夠自由。……世界各弱小民族都很贊成共同來求自決。」

這可以看出 孫先生聯俄的本意，是在普通民族自決的一點上，但不是如一般共產黨視為如何特殊、如何神聖的；而且孫先生聯俄只是一種對外政策之一，也決不是終身賣絕的契約，不容更改的。蘇俄今日能以平等待我，我固應與之聯合，若蔑視我民族的獨立，侵犯我民族的自由，則吾人亦與其他帝國主義相等看待，這中間也是很顯然的道理。可是經共產黨年來的宣傳，便幾成爲本黨天經地義的神秘的祖訓。其實這已與 孫先生聯俄的本來精神相違了。總之，本黨之與俄國表示好感，在能互以平等相

待，決不是離開我民族獨立的。

(3) 誤認社會革命爲中國必經的途徑——中國以地大物博，日久猶停滯於農業手工業自足經濟之下，所以近代資本主義還沒有在中國形成而中國的經濟組織，與歐美比較起來，依然是——孫先生所謂『大貧小貧』的程度。所以中國此時實有避免社會革命的可能。而俄國的世界革命政策，尤不能施行於我國。這點——孫先生早已看得很清楚。所以先生說：

『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司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司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不知中國只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裏，當然可以用馬克司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司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使用不着。』

馬克司的主張，既不足以解決中國今日的社會經濟的問題，那麼社會革命的話，只是空想。本黨的民生主義，就注重在消滅社會革命的慘局。一

方面在資本主義未發達以前，用調劑的方法，防止資本階級的發生；同時并須竭力避免採取階級鬥爭與無產專制的手段。可見社會革命並不是中國革命必經的途徑；共產黨想利用本黨勢力，潛謀社會革命，亦只是作僞心勞日拙而已！

我已經把近年以來共產黨曲解總理的主張，與一般人對於本黨的誤解，綜合爲三點，加以具體的解釋，使大家知道共產黨在中國的陰謀，只是做夢，決無實現的可能；同時並以此三點作本章結論的焦點，說明我民族目前所處的危機，與我們今後對於國民革命前途應有的努力，求在本黨主義的基礎上，得到我族之獨立與自由。

當前的事變，已經昭示我民族已處於非常危迫的時期。就國內的情勢而言，本黨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外，還要做一種肅清國民革命戰線上反動腐敗份子的工作，抑止共產黨危害本黨的陰謀。在國際上，目前遠東形勢，已經回復到一九零四年的局面。英俄兩大野心的國家，因掠奪中國



權利的衝突，將以中國爲他們決鬥的戰場，我民族行將爲人俎上肉，這一個嚴重緊迫的時期中，我民族是應如何去努力奮鬥呵！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回想到一九〇四與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我民族所受之創痕，是如何慘痛的事。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他們戰爭的結果，依仆次茅（Portsmouth）和約，把滿洲所有的權利，和朝鮮的宗主權，作了他們的勝利品，我民族徒供他們的犧牲。一九一四年我們受日本的威脅，加入了帝國主義的戰爭，但結果使山東的權利，又作了日本的勝利品。這些過去慘痛的事件，在在都可以證明我們在帝國主義衝突局勢下，依賴生存，徒任帝國主義者支配，只是吃虧，不能求得一點任何利益，這也許是大家都承認的。

自俄國革命以後，第三國際挾俄國共產黨的勢力，欲想以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的手段，完成他們的所謂『社會革命』，於是便拿極柔和的態度，願誠意的與各弱小民族聯合。所謂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合的標語，

便成爲近幾年來最時髦的口號。我們也相對的承認這種聯合戰線是推翻帝國主義的勢力，但可惜他們不能言行相符。他們階級鬥爭『縱』的聯合，却衝破了民族鬥爭『橫』的聯合；我們在與帝國主義短兵相接時，我們自己民族的敵壘裏，早已發生崩潰了。這不待帝國主義的進攻，而我們自己的戰線早已瓦解。試問這種聯合的勢力，還能維持永久嗎？恐我們不獨不能解除我民族自己的痛苦，反要作爲他們兩大勢力的鬥爭場，從這樣看起來，我民族實無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也決不能從這中間求到我民族的去路，更是顯而易見的事。

目前遠東局勢，已形緊張，英俄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英國是世界上最帝國主義的領袖，是世界最反動最保守的中心。帝國政府希望統一全世界，非只一日。自俄國以社會革命號召各先進國的無產階級與弱小民族以來，處處足以危害英帝國政府在世界上的權利，而遠東的印度與我國更成爲他們競爭的焦點。從英國的利害關係上說起來，俄國實爲英國心腹大患；

而在俄國方面，欲推行他們的世界革命，首先非打翻這資本主義祖國的大不列顛不可。所以數年以來，盡力煽惑在英帝國政府統治下的殖民地，使他們起來推翻英國的舊勢力。他們這種相爭互鬥的形勢，本不自今日始，不過到了現在更爲劇烈，更爲緊迫罷了。

歐洲帝國主義的英法，以前對俄採取的手段，還沒有現在這樣堅決的原故，固然是因爲英國想從俄國購得大宗的原料，銷售大宗的商貨，不願與俄國斷絕邦交，而最大的原因，則在歐洲混亂的局勢，實在不能容許他們有何遠謀；但是，自從前年（一九二五）的『保安公約』（Security Pact）結妥之後，歐洲方面的問題，可以暫行和緩，英法各帝國主義的列強，便移其眼光轉注於遠東方面，因爲俄國既不能在西歐與各資本主義的國家相對抗，便注其全力，與東方各弱小民族，互相提攜以抗列強。於是英美法各國因之不得不設法阻止俄國在遠東的發展。在這種局勢之下，日本又因內閣的改組，田中當局，於是英日又有繼續聯合以抗俄國的可能，英俄兩國，目前都

已劍拔弩張大有迅即接觸之勢。

這樣緊迫的危局下，我們的革命戰線內，有中國共產黨乘機叛亂的事情，他們固然是想陰謀破壞本黨的組織與國民革命的事業，而最大的目的，則在消滅我們革命的力量，使中國民族於無可奈何中，不得不求助乞憐於蘇俄，那時蘇俄便可以扶助弱小民族為藉口，仗義興師，與帝國主義的列強，在中國搏戰，那時我民族只有做人俎上肉，聽人家的支配。結果是轉入世界革命的漩渦，我民族的自信力，便在世界革命的漩渦中消失下去，前途真不堪設想！

近年以來，各弱小民族的國家，都以『民族自決』為求獨立的目標。南美拉丁同盟之對抗英美，土耳其、愛爾蘭、希臘、波蘭之謀獨立，印度埃及民族運動之興起，很熱烈的表現出民族自決的精神來。我們應該要明瞭的是一個民族的生存，應有獨立自決的絕對必要。帝國主義之強力宰割各弱小民族之土地與人民，視為他們的囊中物，固然是民族的大敵；同時以平

等結合各弱小民族爲口頭禪的蘇俄，若是以大國的威力，欲侵犯我民族的獨立，亦在我們反抗之列。以前蘇俄的代表鮑羅廷，對於我民族，竟視爲第三國際之囊中物，鮑氏個人儼然以『委任統治者』自命，這固明明侵犯我民族的獨立，也爲我們所不能容忍的。若強使我國轉入世界革命的狂潮，消失我民族的自信力，尤在吾人極端反對之列。

我們並不是狹義的國家主義者，我們始終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我們的民族主義是廣義的，具有世界性的主義，同時還有民權民生兩主義來互相爲用的。所以三民主義還是整個的主義。我們今日已到生死存亡的極危迫的時期。我們的去路，只有『民族自決』的一條路，才是我們的大道。我們相信中國民族自己實有可以獨立生存的能力。尤其是在今日兩大野心勢力行將馳騁在我民族疆土之內的時候，我們偶一蹉跎，便會失掉我民族的生存權。我們要求在這緊迫的局勢下，以我民族自信力，殺開一條血路。在這國家生存競爭的世界中，努力求我民族不爲他人的魚肉。我

國家的獨立與自由，是要在我民族的肉搏之中求得。

我的結論是：

(1) 中國共產黨曲解本黨主義思想驅使我民族去做第三國際世界革命的犧牲品，是侵犯我民族的獨立，與帝國主義之驅使殖民地，同一的爲我民族的大敵。

(2) 在國際形勢的緊張時期中，我們只有根據『民族自決』以民族的自信力，去向一切妨礙我民族發展的惡勢力相鬥爭。我民族的獨立，是要在我民族一致的奮鬥中，始能求到。

(3) 共產黨想分裂國民革命的戰線，減少我們革命的力量，我們應以全力肅清我們戰線內的叛亂分子，鞏固我們的陣地，在四面楚歌聲中，求奏民族自決的凱旋，以實現 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



## 今日之革命與革命者

徐天一著 定價三角五分

革命運動在現在可以說是告一段落，然而在革命的內部，却含有一個危險：革命與反革命問題——就是革命者與反革命者的涇渭莫分。本書作者有鑒於此，以極平易動人的文字，說明革命的原因與對象，革命者的真義與使命，末了詳論革命者對付慾望的方法；并在第四章中，下了一個革命的定義。不啻是在革命與反革命，革命者與反革命者之間，劃出一道鴻溝，確是現在革命青年所必讀之書。

## 工會條例釋義

定價五分

現在勞工運動一天發展一天各勞工團體都感覺到工會條例的必要。這工會條例，是十三年十一月間孫大元帥正式公佈過的，現經邵元冲先生逐條加以簡明解釋，刊印成冊，以供一般勞動組織者的研究。



美學

本書

識概

美底

論域

隨處

不生從日

# 黨化教育概論

王克仁著 定價二角

這本書是搜集了孫中山先生的許多意見，確定黨化教育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先說明黨化教育的意義，再述說施行的重要目標，再次則討論實施的原則和方法，末更連帶論及和黨化教育相關的諸問題，如教會學校，私立學校等。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初版

蘇俄民族政策之解剖（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作者 楊 幼 炯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三十一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五至九十一號

分發行處 民智書局  
南京 武昌 漢口 廣州 杭州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九十五至九十一號



546.52

273

2